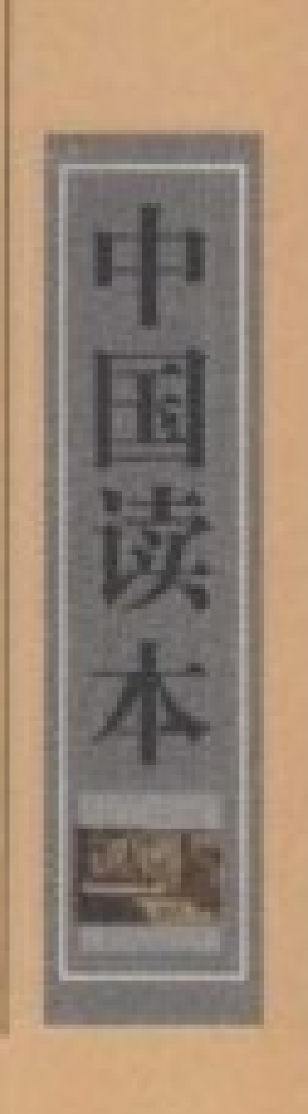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史话

戴扬本 著

二十世纪初至如今，越来越多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被发掘出来。这些深藏在地下的远古文化遗物一旦重见天日，便以无声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人类的经济活动……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读本

中国经济史话

戴扬本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ISBN 978-7-5078-3190-0
9 787507 831900 >
定价：16.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史话 / 戴扬本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4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190-0

Ⅰ.①中… Ⅱ.①戴… Ⅲ.①经济史—中国—通俗读物 Ⅳ.①F1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7224号

中国经济史话

著　　者	戴扬本
责任编辑	刘川民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70千字
印　　张	9.75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10年4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4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190-0/F·326
定　　价	16.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揭开远古时代经济的神秘雾纱 …………………… 1

一　有巢氏、燧人氏和神农氏的故事 …………………… 2

二　星罗棋布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 6

三　大同与小康 …………………………………… 17

第二章　青铜时代 …………………………………… 21

一　若明若暗的夏代经济 …………………………… 22

二　上古经济的鼎盛时代——商 …………………… 26

三　由盛至衰的西周经济 …………………………… 33

第三章　春秋与战国 ………………………………… 41

一　铁犁与钢剑 …………………………………… 42

二　商业与城市的繁荣 ……………………………… 49

三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 ……………………… 56

第四章　秦汉一统 …………………………………… 61

一　繁盛而短暂的秦朝经济 ………………………… 62

二　从清静无为到有为的失败 ……………………… 65

三　东汉经济的恢复 ……………………………… 72

第五章　混沌与秩序 …………………………………… 77
一　鼎足而立的三国经济 ………………………… 78
二　十六国北朝的经济 …………………………… 82
三　江南经济的开发 ……………………………… 87
第六章　再现雄风 ………………………………………… 95
一　昙花一现的隋朝繁荣 ………………………… 96
二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 100
三　盛极而衰的唐后期经济 ……………………… 106
第七章　神奇的无形之手 ……………………………… 113
一　精细耕作农业体系的形成 …………………… 114
二　巧夺天工的手工业 …………………………… 119
三　煌煌灯火话夜市 ……………………………… 123
四　民族经济的融合与发展 ……………………… 128
第八章　鸡鸣晓看天 …………………………………… 133
一　鱼鳞图册与明初经济的恢复 ………………… 134
二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 138
三　盛世与危机 …………………………………… 143
四　走出中世纪 …………………………………… 148

第一章

揭开远古时代经济的神秘雾纱

一　有巢氏、燧人氏和神农氏的故事

远古时代的历史，是靠祖辈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的故事保留下来的。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今天居住的这片土地，气候要比现在温暖，到处都是茫茫不见边际的森林和茂密的草丛。居住在这里的早期人类，依靠集体的力量与野兽展开殊死搏斗，分食兽肉。同时，也采集一些植物的茎块、果实充饥。白天，他们四处活动；入夜，则栖息在树下草丛中。露宿的生活，使他们不得不忍受夏日的日晒雨淋和冬天的凛冽寒风。此外，还得时时提防着猛兽、毒蛇的侵袭、噬咬，生活是极为艰辛的。有一天，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教会大家在粗大的树干上搭筑起栖身的巢穴，有了这样的固定居所，劳累之余，人们能够得到比较安定的休息，多少减轻了风雨霜雪带来的痛苦，生活的条件明显改善了。人们怀着感激的心情，称他为“有巢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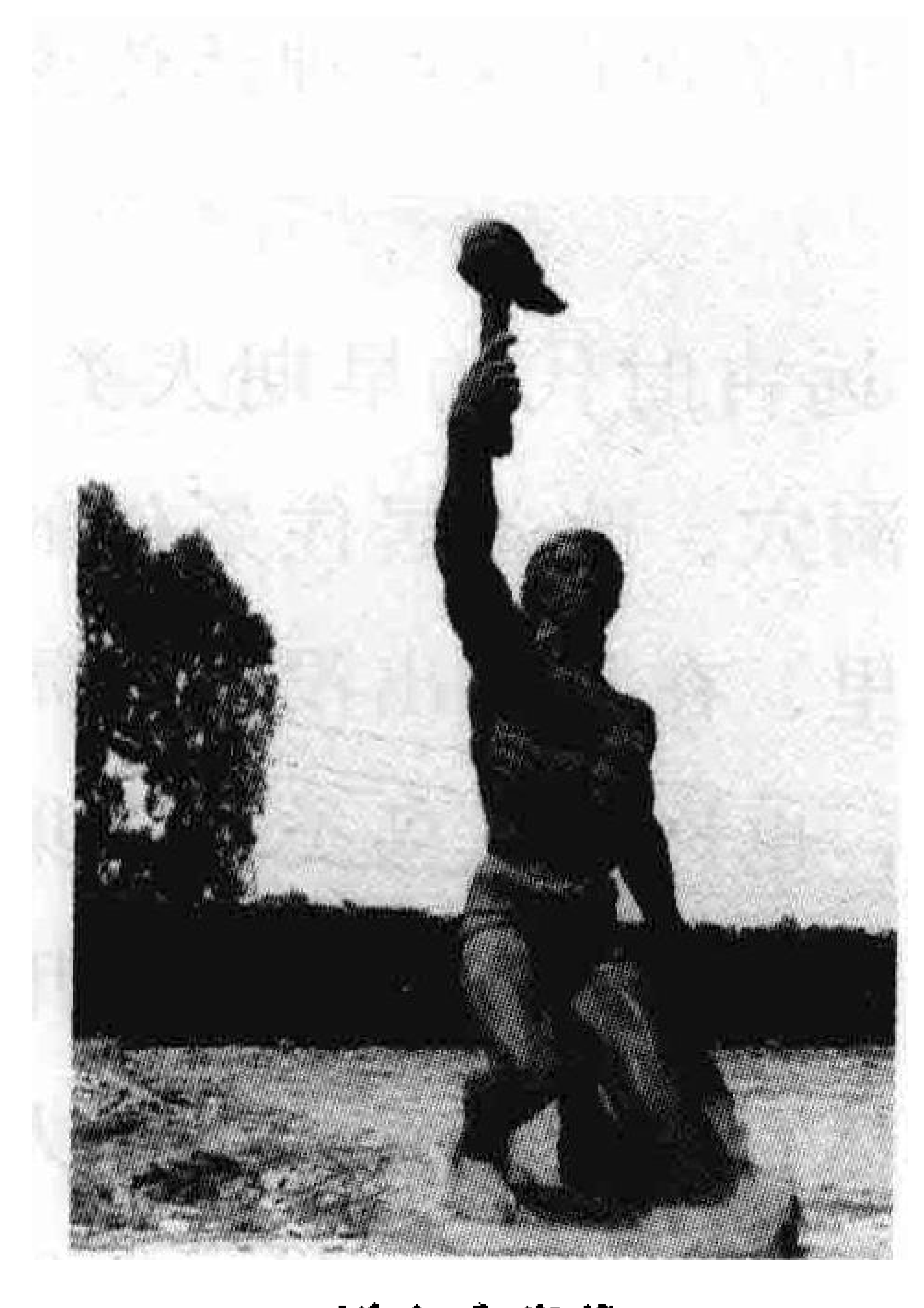


有巢氏塑像

后来，又出现了一位非凡的人物，从他那里，人们学会了以燧石相击和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取得火种比以前方便多

了。大家长久地怀念这位给生活带来温暖的人，称他为“燧人氏”。

神农氏的发明，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关系更加密切了。据说翻地用的农具耒、耜是他发明的，他还教会了大家种植五谷庄稼，他的儿子则教人们开始种植蔬菜。还传说他曾经尝遍百草，将其中具有治病救人功效的药草告诉了大家，因而他也是医药的发明人。又说他在耕作的同时，教大家制作陶器。他还发明了织布的方法，从此，人们不再用兽皮和树叶来遮身了。



燧人氏塑像



神农氏塑像

相似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几乎人类早期社会出现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与某一位非凡的人物有关。比如教会大家驯养牲畜的叫伏羲氏，他还是结网捕鱼的发明者。甚至还传说他夜间仰望天空，俯察地面后，悟到了自然奥秘所在，画出了八卦图像，发明了文字，还教人们在绳子上

打不同的结扣来记录日常发生的事情。



伏羲氏画像

显而易见，这些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在几千年以来的流传过程中，已经被赋予浓厚的神话色彩。这是我们人类在童年时期具有的共同心理特征。今天，当我们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观点和方法，对这些神话传说一一加以辨析，便不难拂去笼罩在这些古老传说表面的神秘雾纱，辨认出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痕迹，并演绎出蕴含在这些神话传说背后的真正含义来。

有巢氏的传说，为我们描绘了远古时代的早期人类，如何从模仿动物的巢穴，学会构筑洞穴，改善居住条件的漫长过程。在草木蔽天的原始森林里，在野兽出没的广阔原野上，先民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也许先从鸟类的居巢受到了启发，在粗大的树干上筑巢栖居。他们也学会利用现成的山洞岩穴，躲避风雨，栖身休息。渐渐地，早期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还尝试用树干和其他材料，构筑自己的穴居，起初是半地穴式的圆形或方形小屋，后来渐渐发展为地面式建筑，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成为后世房屋、宫室最原初的形态。

燧人氏的故事，表明早期人类如何从不知熟食的茹毛饮血的时代，进入到学会人工取火的过程。原始人类最初是生吃猎物和果实根茎的，后来，经过长期的反复观察，

他们学会了利用偶然机会得到自然火，如雷电或火山爆发引起的森林大火。他们渐渐发现，火不仅可以取暖和驱赶野兽，还可以用来加工食物，而且，烤熟的兽肉吃起来更为可口。于是，从利用到学会保存自然火，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人们在实践中又发现了用燧石撞击或钻木取火的方法。火的广泛使用，尤其是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标志着人类在生产技术上经历了巨大的飞跃，人们获取食物的范围比以前更加广泛了，防御能力增强了，体质有了明显的发展，脑容量也增加了。火的使用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早期人类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革命性的成就。

从神农氏和伏羲氏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社会后期，农业和畜牧业如何发展起来的痕迹。随着人口的增加，氏族社会的发展，人们由四处迁徙的生活方式逐渐变为定居生活的形式，单纯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已经不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了。而采集活动中人们渐渐发现某些植物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实的规律，相对定居的生活使人们栽培这些植物变为可能。于是，在长期居住的洞穴附近，人们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年复一年地播种、收获，产生了最早的原始农业。随着农业的发展，某些被猎获的野兽被驯养成家畜，数量也普遍增多起来，畜牧业得到了发展。粮食是需要使用一定的炊煮器加工后食用的，当粮食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食后，陶器随着人们的需要便产生了。人们还用麻类纤维织布缝衣，告别了用兽皮遮身的时代。随着

对植物认识的加深，人们也开始取得了一些草药治病的知识。神农氏带给人们的一切，正是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形成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图景。

这便是关于远古时代历史传说所蕴含的真实意义。

二　星罗棋布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被发掘出来。这些深藏在地下的远古文化遗址一旦重见天日，便以无声的语言，栩栩如生地为我们讲述起关于远古社会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来。

能否制造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大约在二百万年前，古猿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发展，演变成了会制造工具的人。人类最初使用的劳动工具是用天然的石头制成的，这种使用石头工具的时代便是石器时代。根据人类在制造生产工具方法上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我们把以打击方法制成石头工具的阶段称为旧石器时代，将大量制造细小石器工具的阶段称为中石器时代，随着原始农业形成而出现磨制石器的阶段称为新石器时代。整个石器时代相当于历史上的原始社会时期。

远古社会的人类经济活动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采集与狩猎经济开始形成，距今大约有数十万年的历史。

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遗址约有四百处，北抵辽宁营口、喀左，西至陕西蓝田、大荔以及宁夏灵武，南及云南元谋、广东曲江，这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展示了约一百万年以来农业发生之前，生活在中国大陆远古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旧石器时代人类生产工具的共同特征是，石片石器占主要成分，其次是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制作石器工具的主要方法是以石锤直接打击，从工具的用途来看，刮削器和尖状器最为普遍。随着采集和渔猎经济的发展，刮削器和尖状器的形制渐渐变得复杂和多样化。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狩猎经济已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制造石器的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出现间接打制方法，最终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并发明了刮削和磨制骨质工具的技术。此外，作为狩猎大动物的有效武器石球，始终是旧石器时代人们围捕野兽所用的重要工具。

距离今天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即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氏族组织已经广泛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南地区，早期人类的原始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各地的文化遗址来看，人们很可能从使用自然火渐渐发展到人工取火，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距今大约二万五千年。高约四米的洞内，中间有一堆篝火燃烧留下的灰烬。火的保存、使用和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狩猎活动中，用火将野兽驱赶到预定的地点以便捕获，用火的威力夺取野兽占据的山洞作为自己栖身之所，还经常用火来烧烤木

棒、竹竿以便制成武器、工具，火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远古时期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效率。此外，人们用火来烧烤食物、取暖、照明和防御野兽的侵袭，改善了体质，脑容量有了明显的增加，人类彻底摆脱了黑暗。日常生活中火的频繁使用，也为制陶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塑像

火的利用，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取火的发明，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只有在自然火被广泛利用并加以保存时，鱼蚌类和小动物才成为人们经常性的食物，狩猎活动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出现人工取火之后，尽管狩猎经济仍附属于早期的采集经济，却越来越显示出其在早期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

从工具的发展来显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另一个标志是弓箭的发明，这在主要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如山西朔县的峙峪、河南安阳的小南海、河北阳原的虎头梁等地发现的石器和遗迹中得到了证明。这也是推动狩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在距今约四万年的山西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里，动物的骨骼数量以吨计，却不见完整的个体，连完整的头骨都未被发现，这证明基本上都是被早期人类食肉后又砸碎的抛弃物，由此亦可见狩猎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远古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通常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石器工具的制造，通常也是就地取材，在近旁的河滩或山岩上拾取石块，打制成合适的工具。然而，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人们对工具的性能有了比较明确的要求，对各种石料的性能和特点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某些比较适合于加工石器的岩石产地，便有人从周围地区不断来此开采石料，制造石器工具，因而，便出现了一些石器制造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文化遗址，便表现了上述特点，我们今天尚能从遗留的大量半成品或废品石器中，辨认出先民试图制成各种用于剥兽皮、刮兽肉的石器工具的痕迹。相对固定的石器制造场的出现，通常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典型遗址山顶洞人的遗物中，人们还发现了长 8.2cm 的骨针，一头是锋利的针尖，另一头是用极尖利的石钻挖成的针孔，骨针磨制非常光滑。此外，还有一些用穿孔的兽牙、海蚌壳、小砾石加工成的装饰品，显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手工艺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经历了大约一百万年的缓慢进展，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经济随着火的广泛使用、弓箭的发明以及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发展速度逐渐加快，终于在大约距今二万年前后，我国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中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历时约一万年。

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我国分布非常广泛。典型的

如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山西下川文化及陕西大荔沙苑、内蒙古海拉尔独山、西藏聂拉木、河南许昌灵井、青海贵南拉乙亥、云南元谋大那乌等地发现的遗址约数十处。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遗址的距今年代也各有区别，大体上距今一万余年到八千年左右。如青海贵南拉乙亥遗址，距今约七千年，其时黄河流域已经进入了农业经济繁荣阶段，而拉乙亥氏族的遗存仍保持着浓厚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

由于中石器时代文化处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既保留了旧的某些特征，也表现出新的气象，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内容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之中。社会经济生活依然以狩猎和捕捞水生动物为主；继续使用打制的方法加工石器、骨角器，大量制造细小石器和复合工具。最具有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的，是石制箭镞的制作，有明显的锐边和周边。此外，石制矛头的出现，意味着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发明了投矛等更为先进的猎具和渔具，生产效率得到明显的提高。下川文化遗址出土的大批细石器说明，复合工具如镶有木制或骨制手柄的刀、锯和长矛也比较普遍地得到使用。工具的改进，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为社会经济出现新的飞跃准备了物质上的条件。

随着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的加强，中石器时代的人们从过去的洞穴山林开始走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在草原、湖沼和河谷间追逐兽群，频繁地迁徙居址，以追求更多的收获。与迁徙生活相应，制造并驾驶独木舟在江河湖泊中遨

游的技术和建筑房屋的技术都发明了。人们用骨针将兽皮缝缀起来，制成便于行动又能御风寒的服装。人工饲养的家畜，先是狗的驯化，接下来为羊和猪，也出现在后期中石器时代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最后，出现了磨光石器技术，一些地区率先出现了陶器的雏形。农业一旦出现，便意味着早期人类进入了原始氏族社会最繁荣的新石器时代。

原始农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氏族制度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中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已经不能保证人们的生活需求，同时，也限制了氏族的迁徙活动。长期的采集经验，很多地区的氏族部落逐渐在实践中学会了使某些植物种子通过种植的方法，获得有效的食物来源，以补充原先采集和渔猎经济的不足。一些最常用的野生植物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培植，成为人们普遍喜爱的粮食，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粟，南方则出现了水稻。农业的发明，又引起了生产工具的革命，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经过磨制的石刀和石镰越来越普遍地推广应用，用于谷物去壳的加工工具如石磨、石臼也制作得非常细致，磨制的石铲用于翻土，取代了早期的木棍、木铲。与磨制技术相继产生的还有在石器上切割、钻孔的技术。

磨制石器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生产的标志。农业的产生，便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

农业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也改变了人们日常食物的结构。为了炊煮粮食，陶器的制作便发明了，并很快成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手工业。我们今天依靠考古

发现的文化遗存来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的依据便是以磨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和以陶器为主的生活用品。

20 世纪以来发现的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五六千年，即新石器早期偏晚阶段以来，远古社会主要经济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脉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早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中期的如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以及晚期的典型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生产非常原始。从黄河流域的诸文化遗存，如磁山遗址来看，虽然农业经济已经占较大比重，但仍然发掘出大量动物骨骼，主要是野生品种，属于家畜类的只有狗、猪和鸡三种。这反映由于农产品数量不足，采集、狩猎和捕捞等活动在经济中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许多地区尚未形成十分稳定的定居生活，氏族居住营地面积较小，房址少、生产工具简单、陶器制作粗糙等共同特点，表明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低下的。生存环境的不同，经济形态也出现各种不平衡性。如中原和华北地区农业经济显然要比华南地区发达，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发现的精致的磨光石器、种类较多的陶器、窖藏的谷物，是洞庭湖地区不可见的。

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发展阶段，也是氏族制经济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新的

农业生产工具逐渐增多，农作物的品种产量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制陶工艺更趋成熟。玉石加工、竹木器和骨角器制作、丝麻纺织业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土木建筑和造船业也呈现新的局面，并开始出现专门为交换而制作的商品。

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文化。从农业生产种植情况来看，粟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此外，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半坡遗址发现的一个陶罐里，盛满了已经炭化了的白菜或芥菜类菜籽。石器农具制作的技术也表现出明显的进步，磨制得比较平整、光滑，生产效率因而得以提高。采集经济和渔猎经济仍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各氏族营地附近，都有大小河流，水产比较丰富，捕捞方法除了传统的投叉击刺外，出现了垂钓和网捞。制陶业是仰韶文化中比较发达的手工业经济，制坯仍以手制为主，出现了形式与风格各异的彩陶花纹，红地黑彩、白色为地再加绘黑、棕色皆有。彩陶图案绘制显然已经开始使用毛笔一类较软的工具。此外，制革工业也是非常重要的手工业，石片刮削器是人们制革时使用的主要工具，表面呈颗粒状的陶锉则被用于鞣制皮革。纺织和编织业比较发达，从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陶制蚕蛹来看，氏族先民不仅掌握了葛麻纺织技术，极有可能积累了利用蚕丝进行纺织生产的经验。骨角器加工除了制作一些狩猎、捕捞用的箭镞、鱼叉以及骨针外，还有许



仰韶文化遗址

多雕刻制作的装饰工艺品，从中可以看出早期人类思想观念中萌发的艺术和宗教的意识。

位于宁波、绍兴一带的河姆渡文化，则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特点。河姆渡遗址中大面积的稻谷遗存，最厚处超过一米，数量之多，世所罕见。这类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地处河网密布的湖沼地带，河姆渡文化的生产工具有大部分是用骨制成的，如耕地用的骨耜，采用鹿、水牛肩胛骨加工制作。骨制生产工具十分丰富，成为河姆渡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此外，木器制造业也十分发达，已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建筑木构件中，出现了可以有效防止构件受拉脱榫的燕尾榫和带销钉孔的榫。木器不仅应用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也做成碗、盆一类日常生活用品。遗址中出土的一件木质漆碗还表明，河姆渡人已经发明了漆器手工业技术。制陶业则以炭黑陶为特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刻画平行条纹、波浪、圆圈等图案。与陶制支座配套使用的陶釜，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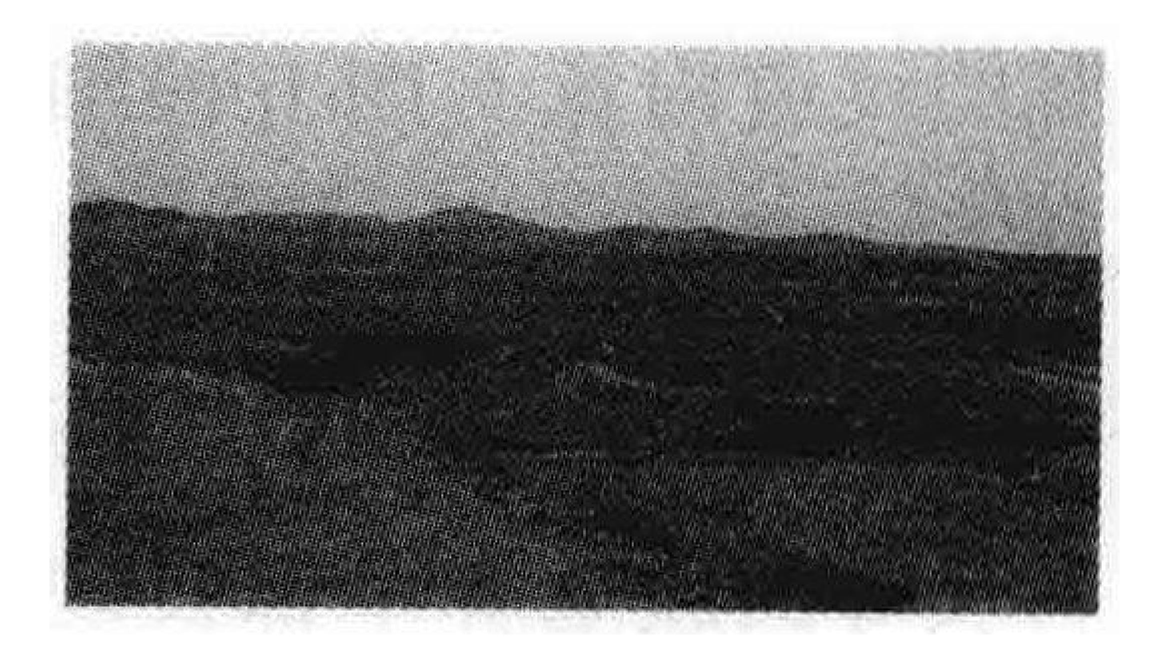


河姆渡文化遗址

公元前三千年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时期。与仰韶文化时期相比，经济发展十分显著，农业生产在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增加了，手工业技术更加成熟。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以及长江流域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有上千处，典型的如陕西庙底沟、

豫北的安阳后岗、山东大汶口、湖北京山屈家岭和被称为长江文明先驱的良渚文化等。

从陕西的龙山文化遗存情况来看，农业工具已占全部工具的三分之一，表明农业已经成为人们经济活动中的支柱产业。大量各种形制的石刀，说明农作物的收获量有了很大增加。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饮酒器具大量而且普遍存在，证实了人们对当时粮食生产能力增加较快，因而酿酒业得到发展的推断。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和畜牧业也空前繁荣起来，马、牛、羊、鸡、狗、猪六种古代主要家畜、家禽都已具备。猪是人们饲养最多的家畜，是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因而也被视为能力和财富的象征，在许多部落的墓地中，都有以猪下颚骨随葬的现象。无论是在黄河流域抑或长江流域，犁耕技术开始出现，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龙山文化遗址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最大的手工业部门制陶业，已经普遍采用快轮制陶技术，标志着传统的制陶工艺经历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作为龙山文化特征之一的黑陶，薄如蛋壳，光洁、明亮，显示了工匠在原料配制和造型、烧制各个工艺环节上高超的技艺。

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发展相当成熟。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

而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玉器为璧、环、琮、璜以及各种形状的佩件、串挂饰品打磨技术和刻制工艺非常精细，有些浮雕上的图案，在一毫米宽的纹道内竟有四五根细线。玉器常以卷云纹为底，刻以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南方地区的墓葬中，玉器常常是主要的随葬品，甚至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广东石峡等氏族墓葬中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玉器，这反映手工业产品的交换，不但在氏族内部进行，而且跨越了地域界限，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各个氏族部落都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包括氏族首领也在不断追求从交换中为自己谋得精美的陶器、玉器。交换使人口集中、地点比较固定的某些集市逐渐成为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最原始的城市诞生了。

龙山文化的城址陆续在黄河流域不断发现，如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辉县孟庄等。长江流域和内蒙古河套地区、辽西地区也有龙山文化时期城址的发现。登封王城岗龙山古城有东西两城，城呈方形，西城的西墙长94.8米，南城的城墙长97.6米，城内面积不足一万平方米。淮南平粮台城市规模较大，城内面积达三万四千平方米。南城墙有城门，门侧有门卫房，路面下埋有向城外排水用的两根陶水管。位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是远古社会极重要的典型遗址，龙山文化也因此定名。近年来，通过进一步考古发掘，“城子”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夏

代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三城重叠而成，龙山文化遗址的城市面积约为二十万平方米，城内东西宽四百三十米，南北最长处达五百三十米。可以想见，四千五百年前屹立在齐鲁大地的这座古城堡，气魄是何等雄伟。

早期城市的产生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的结果，龙山文化时期城市的出现，意味着远古社会的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代，终于叩响了文明时代的大门。

三　大同与小康

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礼记》曾经这样描绘过上古社会：天下为公，大家推举能十、公正的人为部落领袖，人们并没有明确的家庭和私有观念。年纪大的长者和幼小未成年的孩子由大家一起抚养，有劳动力的人尽自己力量为公众做事。财富不属于个人，所以，没有盗贼，也没有为自己利益玩弄计谋的人，连主人出门在外时，家里的门户也不必关闭。这样的社会叫大同。后来，社会风气变了，人们有了明确的家庭观念，也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大家都尽力使自己家庭变得更富有。原来的部落首领变成世袭制，不再是大家推举公平、能干的人来担任。建起了城池，制定



《礼记》

了君臣、上下、礼仪制度，划分了各自的田地。这样的社会叫小康。

《礼记》虽然是后人对上古社会的追述，对于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描写，却基本上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真实情况。从大同到小康的社会发展，正是原始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的表现。

原始人群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那时候，人类与自然斗争的能力比较低下。从中石器时代开始，母系氏族社会进入了发展时期，促使这种形态发展的，则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经济的繁荣。首先，妇女是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和纺织业的主要发明者，她们的劳动成果为人类提供了较采集和渔猎远为丰富的衣食之源。此外，妇女还承担着烹煮食物、生育子女等重要的事务，男子通常还停留在渔猎的生产领域，并没有突出的作为。妇女于是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到中期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表现出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待遇较高的典型特征，即妇女的随葬品明显多于男性。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时期，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子逐渐进入了由妇女承担的传统劳动领域。如农业的发展，犁耕的出现，增加了劳动强度，使男子在生产中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畜牧业也是如此。在手工业方面，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制陶业采用了新的技术，特别是采用快速陶轮，

烧制陶器的窑室也得到进一步改进，容量大，劳动强度高，妇女于是逐渐退出了从事制陶业的劳动。

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男女社会分工，男子成了经济生产的中坚。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子女世系按女方计算，男子无子女可言。当男女在生产中所处地位变化后，渐渐出现了按男性世系将财产传给自己亲生儿子，动摇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基础，最终导致了家庭和私有观念的出现。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劳动所获的产品，除了维持生活基本需求外，还略有剩余。当家庭形成后，剩余产品便成了家庭的私有财产。于是，在父系氏族社会里，出现了财富占有的不平等。某些墓葬的葬品多寡极为悬殊，大汶口墓群的随葬品中，有的不仅使用木质葬具，还有大量的陶器、骨器、玉器、象牙，个别墓葬中随葬猪头多达十四个，显示了墓主生前拥有财产十分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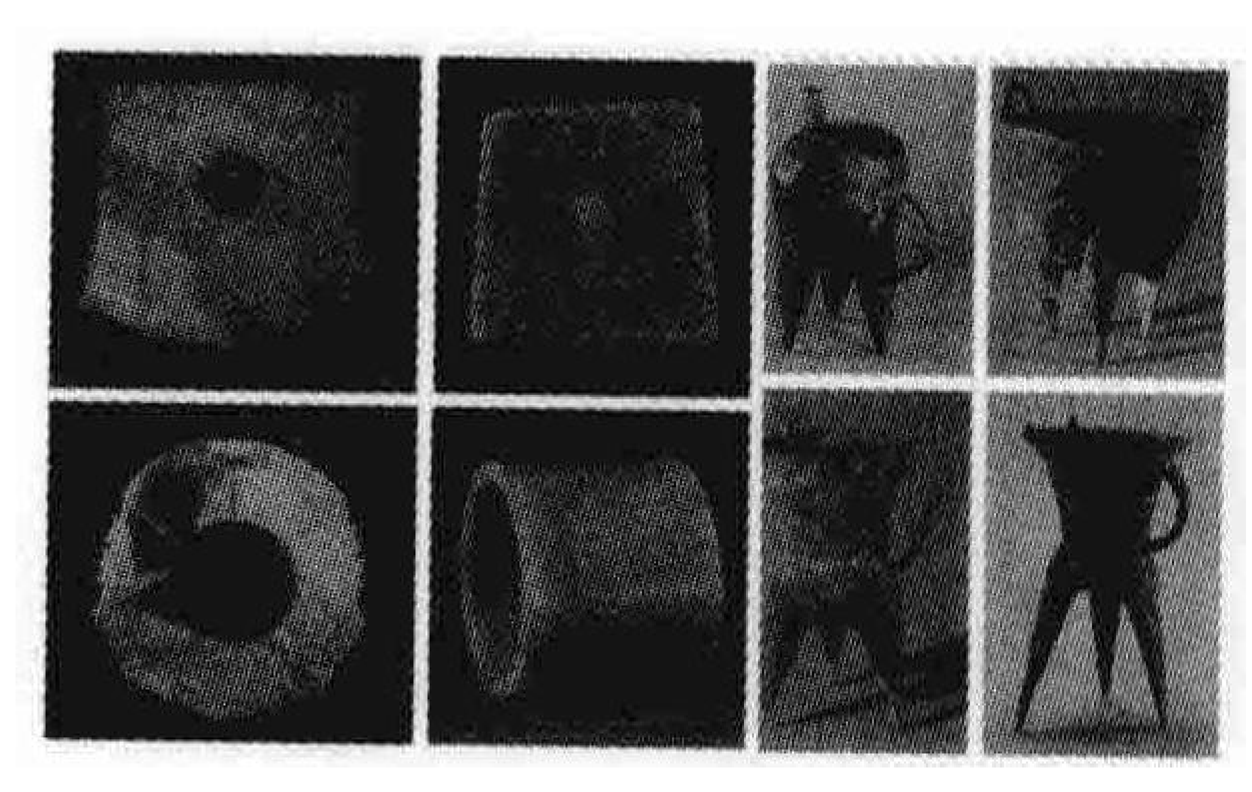
第二章

青铜时代

一　若明若暗的夏代经济

夏代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最早的一个朝代。关于夏代的文字记载非常有限，又多带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史学界甚至有人怀疑中国历史上是否确实存在过夏代。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大批夏代纪年内的文化遗存，较有力地证实了从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前 16 世纪，中原地区在龙山文化之后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

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心区域的代表性文化，从这些文化的遗迹和遗物，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夏代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较，可以看到，当时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关于龙山文化末期禹受舜的委托治理洪水的故事，反映人们对水利灌溉工程的重视。到了夏代，曾经统一部署了水利工程的建设，使农田得到有效的利用。由于农业生产已经能够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猪、狗、羊等家畜饲养较以前有了增加。从墓葬中常见觚、爵等酒器随葬的现象推断，当时的饮酒之风也比较普遍了。


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

夏代农业生产中开始大量使用奴隶的劳动，日益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也对传统的

农业生产工具进行改造，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量。

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人们对植物的生长和一年四季气温变化周期之间的某种联系有了较深的认识，夏人积数千年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发明了四时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制定了《夏时》和《夏小正》等历法。《夏小正》按照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载了物候、气象和重大政事，其中谈到了有关农业耕种、修补农具、采桑、养马等具体的工作，是最早记录我国农业经济的珍贵文献，并有力地促进了后世农业生产的发展。

手工业中青铜器的出现，证明夏代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从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坩埚和铜渣来看，铜爵胎壁较薄，表面尚无装饰纹样，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简单、粗糙的特点。工具和兵器是用单范铸成，爵则用复合范铸成。青铜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陶器制造业仍然是夏代最主要的手工业。陶器的种类中，有作炊具的鼎、鬲、折沿深腹罐等，作食器、容器的有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擂钵等，还有一些酒器，如盉、觚、爵等。此外，在二里头文化遗址还发现，有一些专门将石灰石烧制成石灰的窑址，附近还有存储石灰的窑穴。看来石灰在当时的建筑业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玉石器制造业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墓葬中出土的玉制琮、圭、璋和其他装饰品雕琢精细，兽

面纹或花瓣纹线条流畅，显示出娴熟的技法。有一面兽面铜牌，上面由二百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木制器具的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如食器、兵器和工具的柄杆，还有木仓形器、木匣、木案等家具。木器的表面还常常绘有彩色图案，十分精美。

从夏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来看，制陶、制石、制骨等传统手工业已经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去，同时，又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木工、彩绘髹漆、青铜器冶铸等新的手工业门类。生产的多样化、专业化，也使社会产品空前丰富起来，从而刺激着商品交换的发生。

与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发展的同时，北方和南方地区的氏族部落也在自己不同的区域里发展生产，经济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如内蒙古地区的夏家店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经济较原来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和制陶业出现较大的变化，而且，都或先或后地发明了青铜器铸造技术。

夏代经济的发展，使物资交流的范围和种类都较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扩大，龙山文化时期形成的城市雏形发展成一定地域内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古代城市。奴隶主贵族为了生活上的安逸，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统治上的威严，纷纷在城里为自己修起了宫殿。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凿井技术就在许多部落居住地得以发明和推广。汲水的公共场所，往往也是氏族成员喜

欢集聚议事的地方，最早的货物交易很可能便发生在井旁，因而，古人把市井二字连组成词，表示商品交易的场所。从记述夏代史事的文献来看，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性的活动。

夏代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加强了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商品交换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据《尚书·禹贡》所述，天下共有八州向夏王朝入贡各自的土特产，这八州的地域北抵辽南、胶东半岛的青州，南至湖南、湖北的荆州，西达陕甘南部的梁州、关中地区的雍州，东达苏皖南部和长江下游两岸的扬州。这些地区的主要物产包括蚕丝、大麻、象牙、皮革、羽毛、织锦、丝绸、珠玉、漆等，异常丰富。《禹贡》是战国时人所撰，也许不足为信，但参照考古发现成果来看，其中许多内容还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因此，从中我们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地方如何向中央王朝纳贡及各地物产的大概情况。

虽然夏代的商品交换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仍能看到以物易物这一氏族社会的主要交换形式的影响。当然，这时候各部落间的物物交换，已经受到部落首领等贵族们的利用，成为他们积聚私有财产的手段。有些贵族还亲自参加长途贩运的商业活动，如商族人的先祖王亥，便曾经驾着牛车，载着帛，赶着牛群，到远方的部落进行交易活动。专门从事商品贸易活动的自由职业者商人还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因为处在奴隶社会早期的夏代，商品经济尚未发展成熟，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尚未从生产领域中分

离出来，这也正是夏代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之一。

二　上古经济的鼎盛时代——商

公元前16世纪，原先居住在黄河下游地区的东方部落商族，在经历了几代人的发展努力之后，一举推翻了夏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了地域更为辽阔的商朝。

商朝是中国上古社会的鼎盛时期，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和手工业，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尤其是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成为商代文明的突出象征。

农业是商代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商代的土地归商王所有。一部分作为王室的田庄，役使大批奴隶，并征集很多平民从事大规模的集体劳动，田庄的收获归王室享用。另一部分土地则由商王按等级分赐给其他奴隶主，作为封邑，其收获供臣下享用。农业生产中采用井田制，即由比较规整的沟洫灌溉系统将田地划分为方块田，既便于管理在田间劳作的奴隶，也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抛荒休耕的管理。

商朝的疆域十分广袤，商王在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土地和山川林泽，一些邦国的土地也并非商王所授，因此，在许多地方，商王只起到象征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对奴隶主来说，奴隶与牲畜和其他生产工具一样，都是奴隶主的财产，杀死也并不算犯罪。虽然奴隶是农业

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统治集团对奴隶并不重视，商朝贵族举行葬礼时，实行野蛮的人殉制度，被杀的奴隶甚至多达数百。

由于改进了石制或骨制的农业工具，使得生产效率有所增加。在长期实践中，人们总结出轮流耕种的方法，从此，耕耜农业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新阶段，不再因为抛荒休耕土地而像过去那样常常迁徙。

从考古发现以及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来看，商代的粮食种类除了粟外，还有黍、稷、麦、稻等品种，瓜果、蔬菜类和桑麻的种植也比较多。

许多商代遗址都出土了各种各样的酒器，其品种之繁多，令人叹为观止，可见饮酒成为商代奴隶主贵族间盛行的享受方式。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处酿酒作坊，屋内堆积有大量的灰烬和陶制容器，还有许多桃、李、枣等酿酒原料的种仁及8.5公斤重的人工培植的酵母。酒的大量酿制，反映了奴隶主贪图享受的生活方式，然而从侧面也可看到，粮食产量的增加，才有可能大量地酿酒。

庄园是商代农业经济的基础结构，通常在数万平方米面积的庄园里，有若干座房屋，以及储存谷物的窖穴，庄园的遗存物中，还包括各类农具和狩猎用具。

畜牧业随着农业发展也愈益繁盛，各地发现的商代墓葬中，还常见羊、猪、狗做祭祀时的牺牲。商代的黄河流域，人们已经学会驾御牛马，在贵族的墓葬旁，还常有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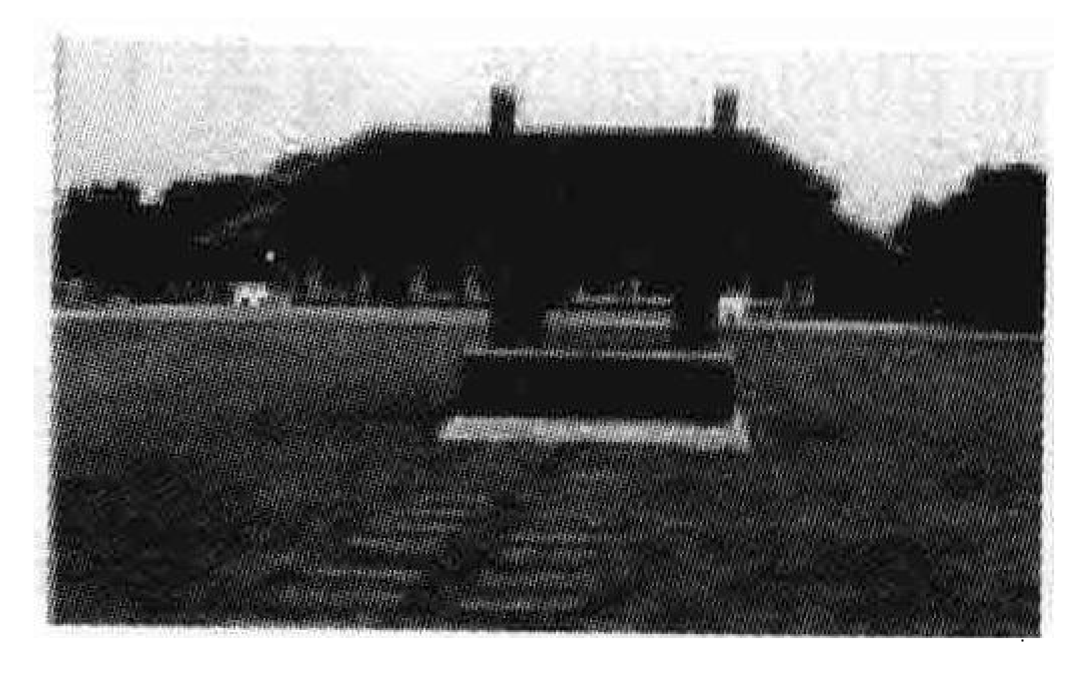
模较大的车马坑。

商代虽然有较发达的青铜铸造业，由于铜的原料有限，很少见到青铜农具，农业用具的原料基本还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和骨制的水平上。相对而言，南方即长江流域的青铜农具使用比较普遍，因而植稻农业技术发展比较快。

商代手工业发展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青铜器冶铸业所取得的成就。

铸造青铜器需要的主要原料是铜矿石和锡矿石，这两类物资出产在南方，通过水陆交通工具的长途运输，运抵商都和各地贵族的青铜作坊。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商代的交通运输事业也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

在王都和各地贵族统治的大邑中，青铜作坊的规模大小不一，其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也有十余万平方米的，然而都拥有一批工艺水平纯熟、分工严密的工匠。殷墟出土的著名司母戊大方鼎，形制雄伟，高 1.37 米，重 875 公斤，如果按每个坩埚熔铜 12.7 公斤计算，铸司母戊鼎需要七八十个坩埚同时并熔。按照每个坩埚燃炭、观火色、运料、运铜液等工作需要三四人操作来计，铸造司母戊鼎时，至少需要三百人同时操作。这样的生产场面，反映了商代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的高度水平。


司母戊大方鼎

在长期的实践中，商代的工匠掌握了根据铸铜的需要，调节

铜锡比例的方法，《周礼·考工记》中记有世界上最早的铸器调剂表。根据人们今天对商代的钟、鼎等青铜器物的化学分析，与书中所说“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的比例基本吻合，这在当时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

显示商代青铜器铸造工艺水平的还有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五件铜编钟，制作精美，可以构成四声音阶序列。在地方贵族铸造的青铜器中也不乏精品，如陕西汉中发现的商代铜器窖藏中，青铜尊的肩部饰有牛头装饰，最高的达44.5厘米。一件牛头形的兽面具，也是其他地区未曾发现，极富特色。这些作品，包括上述司母戊大方鼎，不仅显示了我国古代工匠杰出的创造智慧和高超技艺，也被世人视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

商代的青铜器制造业除了上面介绍的礼器和兵器外，也制作了一些铜镜、酒器和装饰品，供贵族和平民日常生活使用。从出土的遗物来看，青铜还被用来制造砍伐、刮削、雕刻等生产劳动中用的小型工具，以及斧、锛、凿、刀、锯、锥等手工工具。青铜工具替代了原来的石制、骨制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我们习惯上将青铜器铸造的出现，看作是石器时代结束、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标志，正是着眼于其新的生产工具的象征意义。处于奴隶制经济繁荣阶段的商代，以它瑰丽、雄浑的青铜器，向后人显示了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风貌。

陶器是人们日常使用最多的东西。除了日常用的器皿

外，出现了建筑用陶，主要是排水管，有的长达42厘米。晚期的排水管中，还出现了三通管。

日常用的陶器大部分是实用性的，如炊器鬲、甑、鼎、釜；食器簋、豆、盂、钵；酒器盉、觚、爵、尊、壶；盛储器有罐、盆、瓮、缸等。还有少数生产活动中使用的纺轮、网坠、弹丸之类。非实用性的陶器包括墓葬中的冥器。

值得一提的是，从商朝中期开始，南方除了硬陶外，出现了表面涂上一层石灰釉的釉陶，这种釉陶是青瓷的前身，因此，也被称为原始瓷器。釉陶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制陶业的一个转折点。

陶器制造业在商朝很发达，分布也非常广，不同的质料和不同的加工技术，各地的陶器纷纷呈现出自己的风格特色。灰陶器比较普遍，也生产了一些红陶、黑陶和白陶。从纹饰来看，有蕉叶纹、云雷纹等，南方则流行几何形图案。由于各地陶器制作水平不一，有些质量较高而受人们普遍欢迎的陶器便成为交换的重要货物。因此，从商代遗留的作坊遗址情况来看，既有一些为贵族专用的小型制陶作坊，也有大批量生产盆、甑之类单一品种的大型作坊。

此外，商朝主要的手工业还包括纺织业、制骨业和玉器加工业等。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过桑、丝、帛这类字，一些随葬的青铜器上也粘有纺织品的痕迹和麻布的残片。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上，丝织品印痕带有朱砂染涂制品和机织罗纹，显然这是一种高级织品，由此也可见商代纺织技术水平之一斑。而骨器的制作，由于金属工具尚不

多见，仍是一种古老而又重要的手工业。除了常用工具如骨锥、蚌刀、蚌镰等农具外，商朝墓葬中出土的骨器还显示了令人称绝的工艺水平，如象牙杯通体刻有精细的图纹，并镶嵌着绿松石片。与骨器制作相仿，玉器的加工工艺水平也较夏朝有了明显的进步，如栩栩如生的玉雕动物，各种玉器表面的浮雕图案，线条流畅，生动传神，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手工业中制陶、纺织、竹木器、玉器加工等行业的专业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许多手工业产品逐渐商品化，奠定了商业产生的基础。到了商朝，不但交换物资的种类和范围扩大了，交换地区也显著增加了，组织产品交换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经常性的活动，商业正式出现了。交通运输与商业同步发展，顺着商王朝开辟的驿路，由奴隶主贵族操纵或委托的中介人以及手下的小臣，驱使着大批奴隶，往来于内地和海滨、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贩运着各地的土特产。也有一些平民，将自己捕获的鱼或编织的草席、草鞋之类拿到市上叫卖。当然，这些商业活动仅占当时商品交易的极小部分，主要的交换活动是在奴隶主之间进行的。而且，交换主要是为满足奴隶主贵族的消费需要，如西方的玉石、东方的珠贝、南方的铜锡矿石、北方的筋角等。

在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常常出现“贝”和“朋”字，贝指海贝，朋则是贝的计算单位，一朋五贝。商朝人非常重视贝，故又称为货宝，是被用于赏赐的东西，也具有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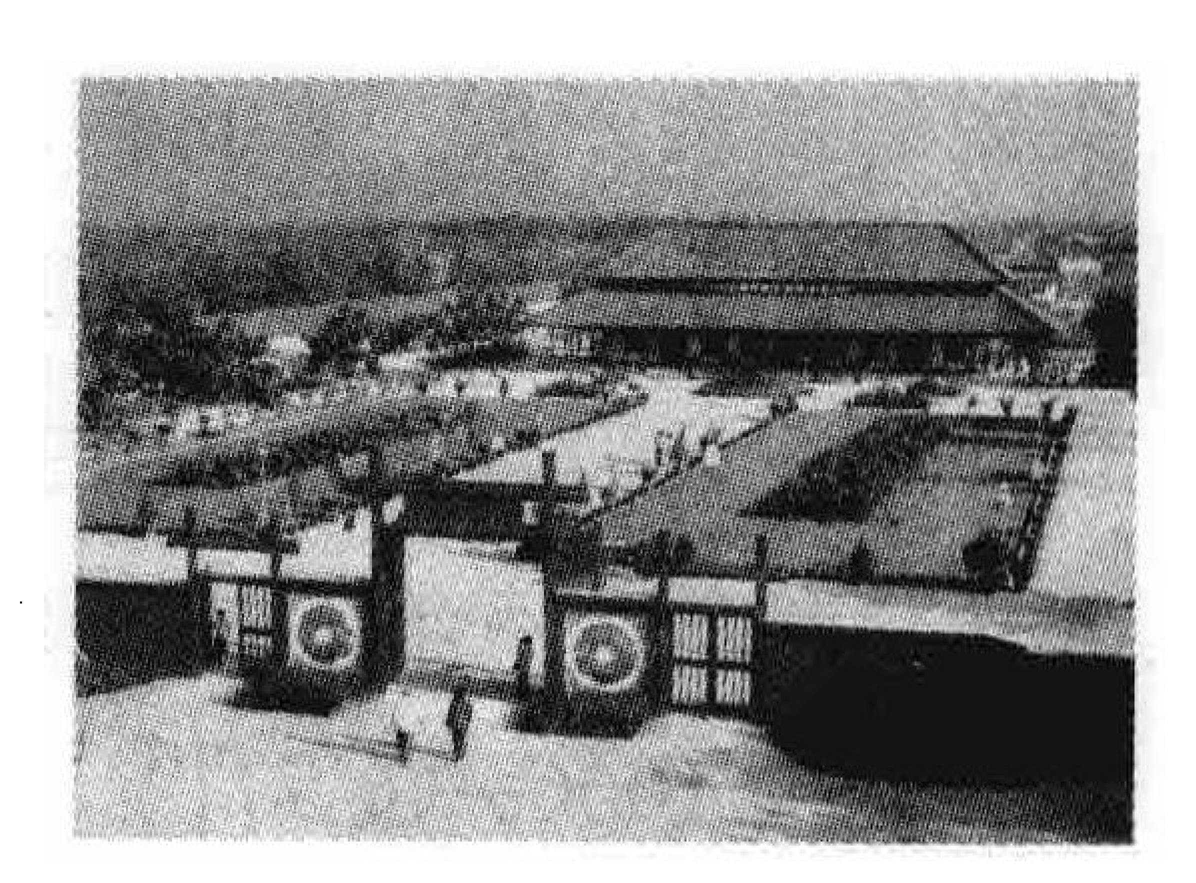
值尺度的职能。此外，甲骨文中如买、贮、贷等字，都从贝字。这些现象说明，贝已经具备货币的功能，开始脱离了装饰的功用，成为市场流通的手段。然而由于贝的数量有限，流通上受到很大限制，商代晚期虽然也出现了铜贝，即金属货币。总的来讲，货币制度还处在商品经济萌芽状态的初级阶段，并不稳定。

城市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商品交换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城市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商朝统治的广阔区域，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我国历史上的早期城市，如商、殷、亳（bó）、蕃等。这些城市既是商王或各属国的王公贵族居住的地方，又是各种手工业作坊的所在地和交换各种商品的场所。我们从考古遗址的情况来看，自从掌握了轮流休耕的农业生产方法之后，城市便比较稳定地固定下来，因而也随之繁荣起来了。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商朝的城市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商朝早期或中晚期的城市，都是用夯打的方法来筑城墙，墙体厚达十余米。城中还建有贵族居住的宫城，宫城内有正殿、附殿、庭院、廊庑，也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上。城外，挖有又宽又深的护城壕。城内特别是宫城里有许多工程浩大的排水系统，包括石木结构的或完全用石块垒砌起来的暗沟。

河南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盘庚至商纣王统治时期的王都所在地。经过几代人的建设经营，城市里殷商建筑鳞次栉比，规模也最大。除了规模宏大的王宫遗址外，还有许多中小奴

隶主及平民的居住遗址，有大面积的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城里还有水井、道路、排水管等遗迹，总面积在二十四平方公里以上。殷墟有一些大型商王陵墓，从随葬的大量精美艺术品来看，显示了青铜时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而成百上千的奴隶殉杀坑，则又使人们看到，奴隶制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是多么低下。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

从商朝各地发现的城市遗址来看，尽管相距数千里，不同地域的城市，在建筑布局、城市基本设施等方面却显示出较大的趋同性，这表明了以商王朝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已经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形成。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城市经济在补充和协调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经济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对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业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主要支柱。因此，城市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商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三　由盛至衰的西周经济

大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商王朝最后一个国王纣王的暴虐统治和他那追求享乐的荒淫生活方式，激化了本来就很

尖锐的社会矛盾，来自西北地区的周族，在周武王的带领下，战胜了商朝的军队，取代了纣王的统治，建立起当时世界东方最强盛的奴隶制王国——周。

史称武王灭商到幽王统治崩溃的三百年左右时间为西周（约前1066—前771）。在此期间，社会经济得到了新的发展，各种经济制度也逐渐完善起来，奴隶制经济进入了全盛时期。

周朝建国，以分封诸侯的形式，加强对广大被统治区域的控制，从而结束了商朝统治时期邦国林立的局面。又制定了一套完整、严格的礼仪制度，用宗法关系将各个诸侯控制在周天子之下。

周天子是名义上全国土地的所有者，诸侯和功臣得到天子的赐田，世代享有，却并没有土地权。周天子可以将赐田收回或转赐他人，所以，我们把西周的土地制度称为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土地不属于私有，土地买卖的现象就不存在了。

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的主要内容。西周承袭了商朝的土地国有制并有所发展，有了较准确的田亩制和比较完整的灌溉道路系统，因而是井田制的完备形态，大致上是以百步为亩，百亩称为一田。

周天子在进行分封诸侯和赏赐百官时，首先要确定封国疆界，并计算出封地内的山林川泽、耕地面积。天子所赐之田称为采邑。事实上，由于周朝疆域广袤，土地国有制只是一个名义而已，分给诸侯百官的土地，都成了他们

的私有财产，王室只是收取一定数量的贡赋而已。真正属于周王的土地，仅在京畿周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和贵族们越来越公开地将土地据为己有，到了西周晚期，土地交换和买卖成为很平常的事，在一些青铜器的铭文中，不但记载了双方交换的内容，甚至还列出在场作证的王室官员名字，以作凭据，可见土地私有制已成为西周后期一个既成的事实。

土地的私有化和土地买卖的出现，是西周社会经济形态中一个非常显著的新现象。

与商代相比，西周的农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从工具来看，青铜制农具的应用略有增加，主要还是以木耒、石耜、骨铲、蚌刀这类工具进行劳动。但在修筑排水灌溉等设施方面，人们积累起较多的经验，并掌握了除草、壅土、施肥、治虫等农业生产技术。收获后粮食的加工和贮藏方法也有了新的进步，并推广了用自然冰贮藏食品的技术。

西周农作物的品种很多，重要的谷物有粟、黍、稷、糜、芑、粱、菽、麦、稻等，有百谷之称。桑麻的种植也非常普遍，豆类和瓜果、蔬菜之类则多种植在用栅栏围起来的园地中。秦汉以后中国大陆的主要农作物，西周时期都已齐备了。

农业的发展，使农产品加工技术也有了提高。酿酒技术较过去进步了，还学会了制造饴糖和煮桃、煮梅、用盐渍菜和制作各种调味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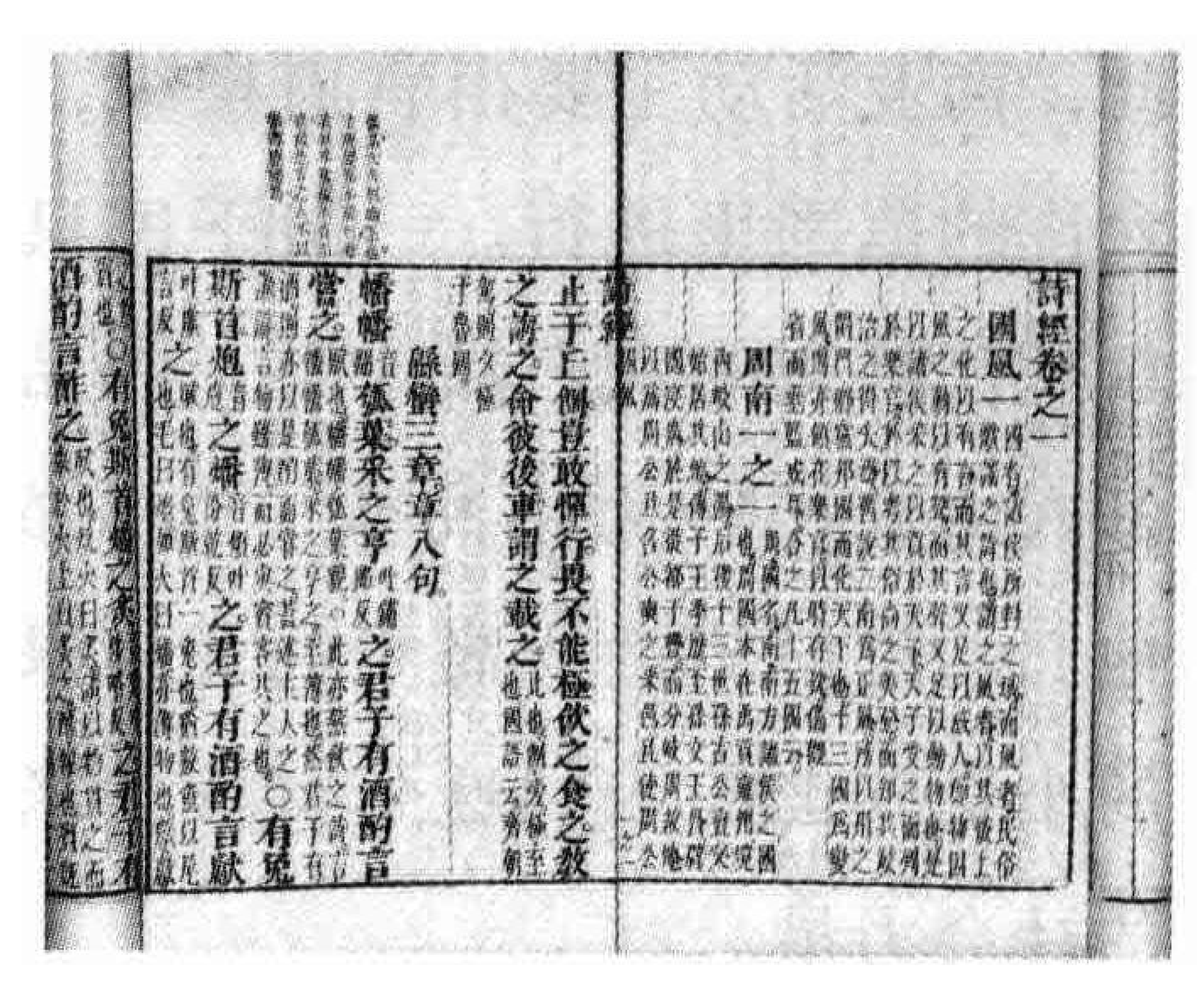
从“耦耕”技术在西周时期广泛实行的情况来看，使

用人群密集型的劳动仍是主要的耕种形式，担任农业生产劳动的主力是奴隶，他们生活在邑、社等农村基层组织中，社会地位很低下。西周中期开始，私人土地和自由民数量有了较大增加，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也逐渐加快了。

在西周的手工业生产中，制陶业和青铜器、玉器等制造业的成就比较明显。以制陶业为例，硬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继续得到发展，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陶器的种类和形制是沿承商代传统发展的，主要在形制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其特有的时代风格。建筑用陶的种类除了水管外，出现了板瓦、筒瓦、瓦当。位于陕西岐山的一处西周时期窑址遗物中，有一批空心砖、条形砖等建筑材料，这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未得到普遍推广，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制砖技术。原始瓷器的数量也较过去增加了许多，并从其生产地南方流入黄河流域广大地区。

青铜器的生产，体现着奴隶社会时期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从现存青铜器的数量来看，西周时期远远超过了商朝，种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兵器中的剑、戟是过去所没有的。器物的花纹也从商代的繁缛而趋于简明的风格，器壁也从厚重趋于轻巧，具有更加朴素和实用的特点。西周的许多铜器都铸有铭文，内容为记载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料，如涉及土地交换情况的散氏盘、卫盉等。铭文最多的如毛公鼎，达四百九十七字，字字珠玑，如同镶在夜空的群星，精光四射，是早期书法艺术作品中的精

品，由此可见当时铸造工艺之精巧。


《诗经》

从《诗经》保存的歌谣来看，三千年前，采桑、养蚕和缫丝、织锦业就已是妇女日常从事的劳动内容了。与商代相似，纺织业的遗迹和遗物很多，从一些丝织物遗留的痕迹来看，刺绣工艺已经发明。而在骨器制作工艺方面，牙雕艺术非常精湛，如象牙杯、象牙杖首等，雕成虎头状，五官刻成细槽，再镶以绿松石片。刻花骨器上的各种花纹非常细致、美丽，有很高的观赏收藏价值，常被贵族作为随葬的物品。在手工业技术方面，漆器的加工发展也开始比较成熟，如西安井叔墓出土的漆案，黑色漆底上，绘有精美红色的图案，整个铜蹄足案制作精致，造型美观。在北京房山出土的燕国贵族墓葬里，彩色漆盾，嵌有铜钉，与长矛成组随葬，反映这两种武器已经被配合使用了。生漆并且还是市场上交换的物品之一，由此可见，我国传统的髹漆工艺有着非常悠远的历史。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西周的商业活动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在奴隶制经济中，作为种族奴隶的商贾，与制陶业、铸铜业等手工作坊里的奴隶一样，都隶属于官府，供王室或各封国奴隶主贵族役使，称为工商奴隶。因

此，商业活动主要由官府操纵，商品的交换也只能在官府允许的范围里进行。一般平民只有在农闲的时候，才能出售一些剩余的农产品或手工制品。也有些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由农民转为小商贩，或替奴隶主贩运一些土特产品，他们的身份当然要高于商业奴隶。西周后期，一些新出现的小贵族也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终于开始形成一种商人的社会力量。

在西周的城市中，市场的设立和管理都由政府直接规定，一天只进行三次交易，朝市以各地大商贾之间的交易为主，日中大市以一般消费者为主，夕市以小商小贩经营的剩余农产品或手工制品为主。入市的货物须按照规定整齐码放在指定的地段。据古书记载，西周时期甚至还规定了未到收获期的五谷、未成熟的水果、未到砍伐期的树木、未到捕杀阶段的禽兽鱼龟皆不准上市，可谓开创了我国市场管理制度的先河。

由于许多商品的交易是经过长途贩运，跨越地域界限来进行的，因而商业制度中，还包括对商税的征收制度，设有专职的司门掌管城门的开闭，司关则对出入关货物进行检查。总的来说，西周官府对行商的长途贩运活动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并没有后世轻视商业的做法。而中原地区和沿海各地频繁的贸易往来，则促进了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货币在交换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开始在西周统治区域里广泛地流通，并成为财富

的象征。一部分统治集团的人物加入了市场经营和贸易活动，使商人渐渐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西周晚期，土地交换和买卖现象频频出现。这一切，都是在西周社会经济活动繁荣发展的表象下出现的，然而，正是这些现象的出现，最终发展成处于全盛时期的西周奴隶制经济的否定因素，预示着青铜时代开始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

第三章

春秋与战国

一　铁犁与钢剑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国都从丰镐（今陕西长安西北）迁到了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始了被史书称为东周的历史。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止，长达五百多年的东周又被分为前期的春秋和后期的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革的根本原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其显著的标志之一，便是铁器的发明和推广使用。因而，人们又形象地将这段历史称为青铜时代结束，铁器时代的开始。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春秋中期即公元前7至6世纪，我国便掌握了铸铁技术。公元前513年，晋国将刑法条文铸在铁鼎上，说明铸造铁器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出土的春秋晚期铸造的铁鼎，不但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史事，还反映了铸铁技术在长江流域也得到了普遍的推广。

我国古代具备铸铁生产能力的关键在于掌握了冶铁鼓风的技术。以皮囊制成的鼓风设备，提高了冶铁炉的温度，也增大了炉内的容量。与欧洲人迟至13至14世纪才使用铸铁的情况相比，我们在这项技术上领先了大约一千九百年。

春秋时期，冶铁技术的另一个进步便是出现了钢。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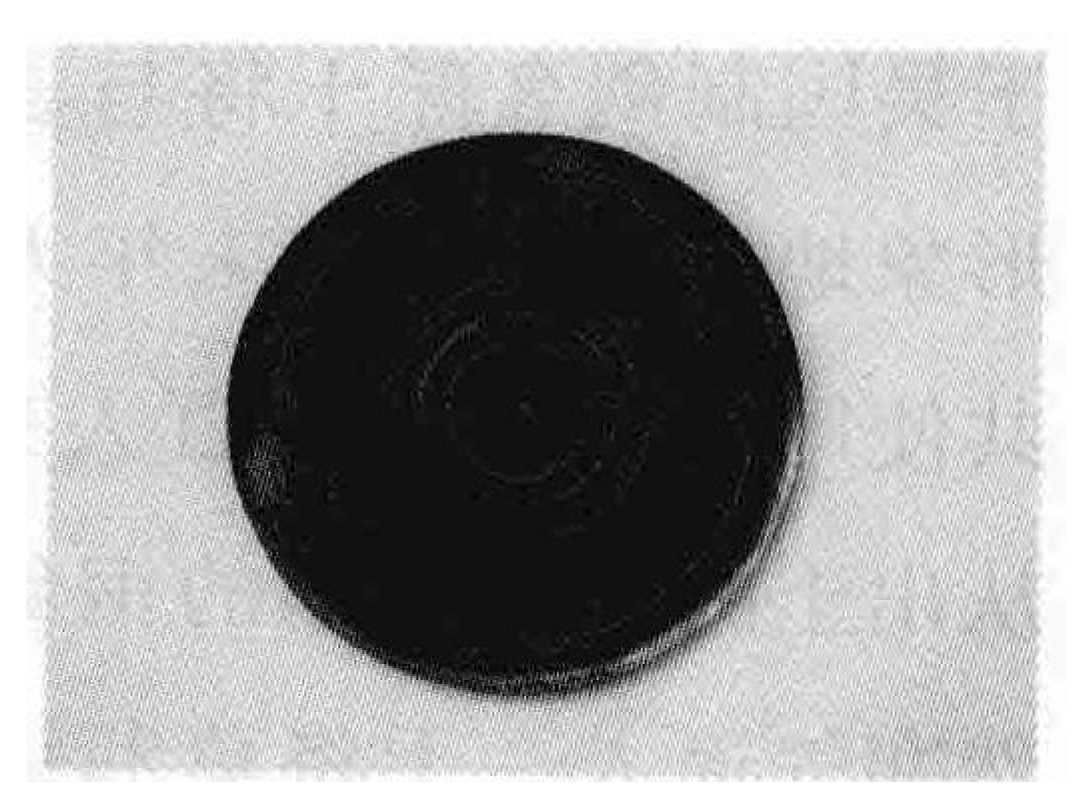
于吴国制剑名匠干将与妻子莫邪铸剑的故事流传很久，它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末年人们铸造铁器的情况，据说铸剑时共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来鼓风装炭，规模是非常可观的。从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钢剑来看，经历了二千多年，剑锋依然寒气逼人，干将莫邪铸剑的故事并非虚构的神话。这个时期的钢是用铁块加热反复锤打，使铸铁内部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而成的，这正是“百炼成钢”成语的由来。到了战国后期，不但兵器中较普遍使用钢制品，铁凿等工具也开始用加热锻打的钢制成的了。

战国时期，铁器已经成为农业、手工业中的主要生产工具。铁矿的开采在我国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冶铁和铁器出土的遗址遍布全国二十余省、二百余处地点，不仅遍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辽宁、吉林、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有许多铁器出土。从种类来看，出土的农具有镰、锄、铲、耙、犁等；出土的手工业工具有斧、锛、刀、杖、锤、凿、钻等；出土的兵器有剑、戟、矛、刀、匕首、镞、弩机、胄等；其余如鼎、釜等生活用具和颈锁、脚镣、车具、钉子，涉及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铁器的大量铸造，还发明了用铁范浇铸的技术。铁范能够连续多次浇铸使用，而且铸件的质量比较稳定，也不必再作太多的加工，从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来说，都是技术上的一次革命，促进了铁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

铁器的应用，使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面貌得到明

显的改观。传统的木石农具如耒耜，改成铁制之后，变得更为轻便。铁制的新式农具还有用于除草的铫（yáo）、耨（nòu），掘土的工具如镢、锹，以及平整土地用的铁耙。铁斧便于人们砍伐林木，是用来开垦荒地的主要用具，而铁犁铧的发明，使耕种方法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在传统的耦耕方式之外，出现了用牛或马等畜力进行犁耕，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二至三倍。春秋战国时期，犁耕现象的出现并逐渐普及，在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战国铁器

农具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使传统的耕作制度发生了变化。春秋时期，休耕制仍是主要的耕作制度，到了战国，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加上灌溉、施肥条件的改善，在同一块田地上，多年耕作、年年耕作制大面积扩展开来，先由中原地带耕地肥沃的魏国开始，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耕作制度。更引人注目的是，战国时期出现了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在种植五谷的地区，如果种植小麦，越冬后夏初即可收割，此后，再播一茬大秋作物，便可能成为一年两收了。

这样，从春秋到战国，如按两年或三年轮种一次的休耕制到年年耕种制计算，便意味着单位亩产量的成倍增长，而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则又可以进一步提高产量，这在农业为社会支柱产业的古代社会，将要在社会经济领域产生

的连锁反应，该是多么广泛而强烈了。

铁器的普遍使用，使人们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也大大提高，春秋后期开始，兴起了修建水利工程的高潮。从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著名的水利工程如春秋楚庄王时孙叔敖在安徽寿县修的芍陂、吴王夫差开凿的运河邗（hán）沟。邗沟的开凿沟通了长江与淮水的交通，后来，夫差又将邗沟接通了北面的沂水和济水，不但使运河两岸受到灌溉方面的实惠，也大大便利了交通运输。战国时，魏国又在黄河与其境内的圃田之间开凿了一条渠道，后来，又引圃田的水入黄河。这样，从长江、淮河便能沟通到黄河。古代两大经济区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联系了起来，这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还有魏国引漳水灌溉邺的工程，齐国、赵国和魏国在黄河两岸修建的防止河水泛滥的工程等，而最著名的是秦国李冰在成都附近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工程了。都江堰工程分三个部分，即将因水流湍急时常在雨季泛滥的岷江一分为二的分水堰，将分流的内江再分为走马河等多条灌溉渠道的宝瓶口，以及一旦洪水太大，将溢出内江的河水引入外江的飞沙堰。都江堰工程变水患为水利，构思非常巧妙，施工技术水平高，从此，四川成都平原一带成了旱涝保收、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通过水利工程的修建，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的例



都江堰水利工程

子还有郑国渠。据说，这条从泾水到洛水的灌溉工程可以溉田四万顷，而且都成了亩产六石的高产田。秦国便依靠这片关中沃野，大大增强自己的实力，最终完成了它的霸业。

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农田的灌溉也形成了被称为遂、沟、洫、浍的大小渠道组成的网络系统。春秋战国时期，各地都有专门负责水利工程的官员对水利灌溉系统进行管理。运用杠杆原理制作的汲水灌田工具桔槔也日益普遍，提高了灌溉的效率，节省了人力。

在耕作技术方面，施肥对增产的显著效果得到农民的普遍重视。除了传统的粪肥、绿肥外，战国时期的人们已经懂得烧草取灰作为肥料的方法，并用动物骨煮汁拌谷种，以提高作物产量。战国时期出现了总结古代农业耕作经验的农书《神农》、《野老》、《后稷农书》，可见人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战国时期亩产量在文献中有较明确的记载，以魏国为例，最高为六石，一般为一石半到两石左右。

铁器时代的到来，对社会经济形态还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矛盾开始突出，表现为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

春秋时期，处于奴隶地位的庶民和工匠，不堪忍受奴隶主贵族的压榨，被迫进行反抗。他们或者从艰苦的徭役中集体逃亡，或者干脆从所居住的国家逃离，投靠到一些

新兴封建势力之下，结成封建的依附关系。这种“民溃”的记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中，甚至出现因为服役人的逃亡，使齐国筑城计划被迫中止，还放弃了东征淮夷的打算。有的国家，出现了民溃，无人守城，导致亡国，春秋时期的梁国和战国时期的宋国，都是这样灭亡的。繁重的徭役，也迫使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工匠发生暴动，春秋时工匠的暴动一度赶走了周王，而春秋末发生在卫国的工匠暴动，结果赶走了卫庄公，使他最后落荒而死。

平民也加入了反对贵族斗争的行列。这些被称为国人的平民，面对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和对国人经济上的压迫，常常联合起来，反对奴隶主贵族，甚至赶走国君。有些国家的新兴封建势力，就是依靠国人的支持，战胜了统治阶层中的旧势力代表，夺取政权。齐国的田氏，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舞台的。

庶民即便不逃亡，平时也以怠工的形式进行消极的反抗。原来依靠庶民共耕公田来榨取他们剩余劳动的办法难以维持下去了，就像当时齐国的一首民谣唱的那样：“别耕那公田啦，上面都是野草啊!”

于是，利用井田制将田地分给奴隶们集体耕种的形式开始发生了变化。有些意识到旧的土地与赋税制再也不能维持下去的奴隶主贵族，不得不将土地分配到个别的农民手中，按照土地的数量向农民收取租税。最先在制度上进行改革的是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明确按照

十分之一的比例向劳动者收取实物税。其实，在此之前，齐桓公执政时，任用管仲也实施了改革，基本内容就是根据土地好坏分别按不同的标准来收取实物税，并废除了井田制中共耕公田的制度。而晋国也实行过类似分田地给农民耕种的做法。鲁国在实行了初税亩之后，又实施了按田亩数摊派军赋的制度，这样，等于宣告了旧的赋税制度的衰亡，新的封建的赋税制度诞生了。

继鲁国的初税亩之后，楚国和郑国也都在赋税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秦国的改革一直到进入战国时才开始进行。秦国的改革虽然起步较迟，但商鞅推行废井田，开阡陌的做法却比较彻底。他将旧的土地制度废除后，使劳动者长期固定占有与使用耕地，还实行名田制来奖励军功，因而秦国土地私有制发展得最快。

这些国家在土地和赋税制度方面的变化，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的总趋势。西周以后，周天子的地位一直处在衰微的过程中，延续了千余年的奴隶主土地国有制随着井田制的瓦解不复存在，在农业生产领域，代替原先集体耕种奴隶的是广泛出现的个体农民，他们形成了封建经济的社会基础。他们向封建国家交纳一定的赋税之后，不再有类似在公田上耕种的徭役，在支配自己劳动成果时有较大的自主权。所以，生产积极性也高涨起来，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与周天子地位的下降成鲜明对照，各国经济发展迅速，实力日渐强大起来。各诸侯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激烈

的斗争，兴师动众，其结果是大国兼并小国，从春秋开始的二百零九国，到春秋末年总共只有二十余国。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凭借的是军事实力，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各国的经济实力。战国时期群雄争霸，铁剑交错，战车驰突，演出了一场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最初却是由那插入泥土中的铁犁引起的。

二　商业与城市的繁荣

战国著名的游说之士苏秦这样向秦王形容齐国首都临淄的繁华：临淄是个非常富裕的城市，那儿的人们，不是吹竽鼓瑟，便在击筑弹琴，奏着乐器唱着歌玩儿。再不然，斗鸡、赛狗、赌博、踢球，反正怎么高兴怎么玩！走在大街上，就更不用说了，来来往往车辆之多，车轴都撞在一起啦；行人之多，肩都挨着肩。大家撩起衣襟，便像四面扯起了帷帐；举起袖子，只怕连天也看不见了；要是大伙甩一把汗，那感觉就跟天上下起雨来差不多啦。

苏秦的一番形容，难免有夸大、渲染的成分。但是，从春秋到战国，城市规模的普遍扩大，出现了一些人口达二十万的超级城市，而且许多大城市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却是没有疑问的。

推动城市的发展，固然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而经济发展却是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因素。正是在农业、手工

业产品丰富的前提下，产品交换的扩大，商业发展直接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毫无疑问，春秋战国时期，冶铜、冶铁、煮盐、纺织、木工与漆器制造等手工业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青铜器的冶铸为例，春秋以后，无论是铜矿开采规模，还是铸造用陶范的设计，都比西周时发展更加成熟。工匠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在铜、锡配合的比例上，根据用器的不同，摸索、总结了十余种效果比较理想的配方。从近年出土的春秋时期曾侯墓编钟的制作工艺来看，全部六十余件挂钟，是按照七声音阶制成，与现代音律相同。总音域跨五个八度，仅比现代钢琴音域两端各少一个八度。这套编钟音色优美，音域很宽，变化音较完备，因此，可以演奏各种曲调。曾侯墓编钟的铸造，被认为是文化史上的奇迹。

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木工的工艺也达到了新的水平，斧、锯、锥、凿、钻、铲等基本工具发展比较齐全，划线则用墨斗合。鲁国的能匠公输班是木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据说他能制造模拟飞行器，他以精巧的木器手艺，博得人们的长久怀念，被尊为木匠的鼻祖。

与纺织业相关的染色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很快。春秋时人们便掌握了化学脱胶炼丝的方法，能将丝绸染成各种鲜艳的色彩。当时，按照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讲究穿相应颜色的服装。在贵族阶层，还讲究用某种颜色的丝绸，来搭配一定的皮裘，可见人们已十分注意服装的颜

色了。

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出现了豪民经营的大型工矿业。最著名的如邯郸以冶铁而成巨富的郭冶，以开采丹砂而成巨富的巴寡妇清，以熬盐而致富的猗顿。这些豪民的财产据说都到了富比王侯的程度。

至于漆器工艺，我们从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漆器来看，颜色已包括黑、朱、紫、黄、白、绿等十多种。部分漆器的边缘还镶有金边，描有图案复杂的龙凤云鸟纹、狩猎场面或几何图纹等，木胎变得轻便、灵巧。漆器制造业的进步，为汉代漆器的制作打下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技术成就，为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增添了缤纷的色彩。

商业本身也较前一阶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西周时期，商业活动虽然由奴隶主贵族操纵，具体经营者很多都是所谓工商奴隶，而现在商业不再是低贱的行当了。曾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和鲍叔牙，都经营过商业。郑国商人经营致富后，连国君都不能对他们为所欲为，反而希望能得到商人的支持。商人活跃在各国之间，甚至还涉足政治，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春秋中期，郑国商人弦高在滑遇到准备进犯郑国的秦军，急中生智，假借郑国使者的名义，送上四张牛皮和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使秦将误以为郑国已经了解秦军的企图，放弃了这次军事行动。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取得成功，周旋于各国诸侯间，备受礼遇。还有一位被后世商人奉为祖师的陶朱公，他就是春秋末年助越

王勾践振兴越国的重臣范蠡。

商业发展，还得力于春秋战国时期交通的进步。各国都十分重视修治道路、发展交通的工作，并设有专门管理道路和桥梁的官员。到了战国时，中原地区不仅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传送行旅和邮寄公文书信的驿传制度也得到进一步完善。这对加强各国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陆上交通发展还带动了水上交通。自从开凿邗沟等运河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沟通了，为南方和北方的货物交流运输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定陶的地理位置处于济水之滨，运河修通后，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范蠡认准这个地方位于天下之中，对从事货物交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遂定居于此，果然成为富甲天下的巨商。此外，海上交通的通道也打开了，吴国大夫曾经率军从海路向齐国发起进攻，越国军队也曾由海路北上溯行至淮水。浮海乘舟旅行的记载不绝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足见当时航海技术已有长足的进步了。

货币——这一特殊的商品，随着经济发展，也逐渐得到普遍使用。春秋时黄金和铜铸币虽开始出现了，但从文献记载来看，统治者进行赏赐，或对征服地区进行掠夺，仍然以粮食、兵器、玉璧等实物为主，钱币在生活中还没有到普遍流行的程度。到了战国，情况便不一样了，金属货币、黄金和实物并行在流通领域。其中，黄金以各国之间流通为主，铜铸币则在民间。当时，主要有四种货币比

较流行，即楚国的铜贝（又称蚁鼻钱），齐、燕、赵流行的刀币，三晋地区的布币和流行在黄河两岸地区的圆钱。

货币的广泛流行，战国时人们的观念上已经习惯以铜币作为衡量某一物件的价值标准。秦国的法律文书中，将禾价定为每石三十钱，一幅宽二尺五、长八尺的布值十一钱，官奴发放衣服费，冬衣每身一百十钱。连政府通缉罪犯时，也以悬赏若干钱计算。

货币是财富的象征，人们遂开始贮藏货币。近年来多次出土战国时期的窖藏货币，多者达数百枚，重量达百余公斤。战国时期，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各国纷纷自行铸币。尽管各地流通的货币有着形制、重量上的差异，却又互相渗透，最终形成了几个经济区，这也是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加强的有力证明。

根据物产的特点，战国时期大致形成了几个经济区，其中，如山西以木材、苧麻、旄、玉石著称；山东沿海一带则出产鱼、盐、漆、丝；江南出楠、梓等木材以及姜、桂等调味香料。生产在南方的铜矿石、锡矿石、铅矿石、丹砂，早已名闻四海。连距离中原甚为遥远的岭南地区，其独特的风物如珠玑、玳瑁、犀角、象牙等也为人们熟知。

全国性的市场，通过各区之间日益密切的商品往来，在战国时期基本上形成了。同时，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城市，成为工商业的中心。其中，有的城市原先仅是政治的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发达，成了著名的商业都

会；有些城市，则是因为经济发达而成为工商业城市。例如燕国的涿、蓟，赵国的邯郸，魏国的温县、轵，韩国的荥阳，楚国的宛、陈，富冠海内，都享有天下名都的称号。齐国依山靠海，土地肥沃，宜于栽种桑麻，土特产丰富，鱼、盐遍售天下。齐国的都城临淄，又正处海滨与泰山之间，且有着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的交通便利条件，所以，临淄的繁华程度，在战国时期的诸多国都中首屈一指。临淄故城遗址中，大城周长十四公里，小城周长七公里。大城为平民活动的地方，小城是齐国的宫殿区，设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国君的宗庙、国家的官署、官吏的宅居。齐宣王招揽天下文学之士，还在稷门附近建造了华贵的房舍，专门接待有名望的学者。

城里集中设置了手工业作坊区，是这类工商业城市的一个特点。如烧制陶器的作坊，铸铜、冶铁、制骨器的加工场。在君王居住的宫殿附近，通常环绕着为宫室服务的铜器、铁器、制陶作坊，是春秋战国时期国都的普遍现象。

当时，城市的手工业区内，还有其他各种行业的手工业者，如制车工匠、善于鞣制皮革和制作皮制品的皮匠。缝制皮革的工匠巧妙地将缝线藏在里面，外面看不出来，经久耐用。还出现了人造琉璃制品，有琉璃璧、琉璃球等。手工业制作的工匠们有些是父子相传的行业，也有师傅带学徒的形式，世代传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艺上往往达到惊人的水平。

城市里最热闹的地方便是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区了。市区通常在宫廷后面，所谓“面朝后市”，设有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除了执行政府对交易物品的各种管理制度外，买卖双方如在交易中发生纠纷，也由这些被称为“司市”的官员调停处理。当时市上的交易，很多是用被称作“券”、“剂”的竹木制成的债据、合同来完成的，执行中若一方不履行义务，便需要司市来判断是非，这也是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市场上的货物可谓琳琅满目。除了与人们日常衣食住行相关的粮食、蔬菜、陶器、各类工具外，还有卖金子和金器的，有卖骏马者，有卖珠宝的，卖建房用茅草的，卖鞋帽的，从《左传》上看到，甚至还有卖踊即假腿的，真是无所不有。卖酒的地方酒旗高悬，醒目的标志老远便能看到，卖酒的商人将酒器收拾得干净、整齐，使人看了赏心悦目，买卖也格外兴隆。连算命求卦的也加入了市场，问卜求卦的人还真不少。

各国政府向工商业征收关税外，还征收市税、房基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税在政府的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因而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便开始成为各国间闹摩擦乃至不惜动用武力来夺取的对象。如居于济水之滨的定陶，交通便利，是商品交易的理想地方，商业格外发达。早在定陶属于宋国时，齐、秦、赵三国都想占领，赵国为此还联合五国伐秦。后来，齐国灭了宋国，又出现了六国联合攻齐和燕将乐毅攻破齐都临淄的战争，秦国率

先攻占定陶。过了二十余年，秦国发兵攻打赵国首都邯郸，魏、楚两国救赵获胜后，魏国便乘机将定陶攻克，收为已有。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是社会分工扩大、生产品交换扩大的结果，不仅促进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也是古代中国社会巨大进步的缩影，因此，在城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对经济活动的各种看法，在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都能寻觅到其历史演变的痕迹。

春秋后期管仲关于发展工商业来增加国家收入的思想，反映了素有重视工商业传统的齐国的现实。管仲出身没落贵族，有过经商的历史，后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在管仲经济思想中，最著名的是四民分业的理论。他把人的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业，并且主张四种职业世袭化，也就是让士的儿子继续为士，农的儿子永远务农，等等。而且，同一行的人在居住上也聚集在一起，理由是彼此易于交流生产经验，提高技术水平。管仲的思想明显带有从统治者便于管理出发的保守性，但却反

映了他对当时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分工现象的敏锐性，尤其是他高度概括了四种不同性质社会分工的特点，以至在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未发生根本变化的二千年间，士农工商的分类，一直沿用到了近代，这不能不说是管仲独到的地方。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政治上比较趋于保守，他也主张正常地进行社会生产。他的学生子贡经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孔子并不掩饰自己的欣赏态度。孔子主张统治者轻税、从俭、节用等，虽然从形式上看似乎在为日薄西山的周代礼制唱挽歌，又含有符合处于变革时代劳动者和新兴地主的需要。在合乎他的“道”的标准的前提下，他不排除对富贵的追求，也主张按照社会的不同分工，各尽其职，以备将来国家之用。孔子的经济思想，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学说的色彩，对后世儒家经济思想影响很大。



孔子画像

春秋末年的范蠡既有政治家经历，又是成功的巨商，他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思想，有很多启人深思的见解。比如，范蠡认为，以谷物为例，如果价格太低，伤害农民的利益，农民就不会有生产的积极性，农田便会荒废；谷物价格太高，商人又接受不了，不愿经营粮食交易，经济便会发生困难。如果把谷物调节在一个适当的价格水平上，农民和

商人都能有利可图，关卡和市场也保证政府的收入，范蠡把这称为“农末俱利”。用今天的语言来说，范蠡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与生产和流通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调控手段，使各经济部门能够协调发展。在二千多年前提出这样的经济思想，不愧是治国和理财兼长的杰出人物。



范蠡塑像

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日益激烈，富国强兵成为各国政治家最急切的目的，而商业的发展，不同程度上会对自然经济产生影响，从而战国时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思想很快转向重农抑商。在这方面代表法家思想的政治家李悝和商鞅是两位典型的人物。

李悝将农业看作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强调国家督促农民种田，以争取好收成的重要性。同时，创“平籴”法，由国家在丰收年景时收购粮食，在欠收年景再平价售出，稳定价格，保证生产的积极性。但他过于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认为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使人民饥寒，令国家贫困。

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不但抑制商业，而且限制和打击一切非农业行业，甚至到了禁止商人卖粮、不许人民自由迁徙、不许人民享受文化娱乐的程度。这在追求富国强兵的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却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这也是战国时期

商鞅画像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典型。

在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中，荀子的经济思想比较完整，他主张重农、富国、富民，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从重农工商到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转变的代表人物。

荀子与商鞅等人观点不同，主张通过富民来富国，富民的途径主要是让民众通过农业生产来致富。国家应该施行减轻农民税收、徭役负担，减少商人的数量，保证农民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农业生产。民富之后，国富才有基础。荀子虽然主张在数量上抑制商人，却又不完全否认商业和贸易的职能，而是希望工商业的发展被限制在一个合适的度里。所以，他也建议修治道路，建旅舍，以便行商往来，并建议关市不必征税，以保证商业贸易能正常进行。他甚至还建议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四方的珍奇货物，供本国人享用，这与他鼓吹合理的欲望应得以满足的理论是相应的。



荀子画像

荀子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章

秦汉一统

一　繁盛而短暂的秦朝经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建立起第一个空前统一的封建王朝——秦。

为了巩固统一的秦帝国，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些措施，包括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健全中央集权政府的财政管理，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加强地区间联系的基本建设工程。

战国时期各国自行铸币，大小、形制都不统一，对经济交流很不便利。秦始皇下令，以秦国货币为基础，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币制。规定黄金为上币，用于大额支付和赏赐；半两制铜钱为下币，为日常市场买卖流通。珠宝、玉石、银、锡之类，只能作为器饰宝藏，禁止作为货币来使用。从而结束了币制紊乱的局面。

战国时期各国实行的度量衡制差别也很大。秦始皇下令废止各国混乱的计量制，以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制为统一的标准。根据新的标准，一丈约合今天二米三，一斛约合今天二千毫升，一石为一百二十斤，一斤约合今天二百五十克。新制成的标准度量衡器，铭刻有关的诏书，发至全国各地。

币制和度量衡制的统一，消除了经济流通中的不便和混乱现象，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对全国经济的控制，

也有利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其意义是非常积极的。同时，也促进了度量衡制的发展，为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础。

秦朝负责管理中央财政的机构是大内和少内。大内长官又称治粟内史，负责田租的收入，主要为管理国家谷物的收发和贮存。少内掌管税收，如山林川泽、盐铁以及人口税等。地方设郡、县两级制，由郡守将每年户口、赋税、钱谷收入如实上报，接受考核。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管理，强化了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

作为加强对全国各地控制的手段，秦在统一六国之后，迅速拆毁了各诸侯国设置的关塞和壁垒，以保证陆路交通的畅通。并调集役夫，进行了一系列的基本建设，如修建驰道，形成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其中，两条主干线分别为咸阳东抵昔日齐燕故国的黄海之滨，和从咸阳南抵吴楚之地。道路用重锤夯实，宽五十步，每隔三丈距离栽一棵青松。从秦始皇五次巡游的路线来看，驰道遍及陕西、甘肃、河北、山东、安徽、浙江、湖南、四川等十二个省数万里之地。此外，还修建了咸阳向北延展至内蒙古包头的直道，长一千八百里，以及沟通岭南与内地的新道。

秦始皇还决通了战国时期被壅塞的川防，在水利工程方面，最著名的是开凿了位于广西境内的灵渠。灵渠全长六十里，连接湘水和漓水，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是我国古代南方最重要的水利交通枢纽。

这些工程的修建，对促进生产技术交流，加强商品物

资流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继战国时期铁器得到普遍使用后，秦代的铁农具又有了新发展，铁犁铧、铁锄、铁镰等农具在形制上有新的改进，成为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的生产工具。根据秦朝的法律，铁器如有损失，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相应处理，可见政府非常重视铁器的分配管理。对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耕牛，也规定了饲养方面的标准，饲养差的要受到处罚，甚至还制定了厩养耕牛的繁殖率。这说明政府非常重视保护耕牛。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提高耕种效率都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秦朝在农业方面的管理是富有成效的，在秦朝统治期间，官仓里的粮食储备非常丰富。关中和中原一带积蓄的大量粮食，在秦亡后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时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刘邦正是凭借这些充足的储粮，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秦代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最重要的手工业是冶铁业，政府专门设有管理铁器生产和使用的官员，从铸铁作坊的遗址来看，官营冶铁的规模非常大。民间也有经营冶铁业的，据说秦始皇曾经下令将一批六国的冶铁富豪迁到巴蜀、南阳等地。这些人迁居后，依靠原有的资金和技术，募民冶铁，重又成为巨富。秦代工匠铸造的青铜器非常出色，从秦始皇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剑、矛等兵器情况来看，制作精良，并经过铬化处理，在土中埋了二千余年，依然不锈不蚀。秦在统一六国之后，据说曾将天下兵器收集后，镕铸为坐高三丈的金人十二个，以及

巨型钟镰（jù）等。这样的冶铜规模，一定是非常惊人的。

制陶业在秦代最杰出的代表作品当属秦俑了。数以千计造型逼真、形体与真人大小的兵马俑，被视为世界上的一大奇观，制作难度之大，工艺之精巧，在今天看来仍是不可思议的谜。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如咸阳宫殿遗址发现的形制美观的瓦、陪葬用的冥器，都表现出独特的风格，显示了秦代工匠的智慧。

秦都咸阳的中心是气势宏伟的宫殿建筑群，四通八达的交通干道将咸阳与全国连了起来。皇家的陵墓中掩藏着无数的珍奇宝货，官府的仓库里充溢着谷物，星散在全国各地的工商业城市呈现出繁华的景象。这一切都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运用专制主义的力量，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聚合而成的。然而，也正是由于专制主义超负荷地榨取人民的劳动，无休止的征发徭役，无止境地修建大型土木工程，残酷的刑法，严重地摧残了社会经济。使得秦代的社会经济，在显示其繁盛的同时，暴露出深刻的危机，旋即陷于崩溃，连同秦王朝一起，毁于农民起义的烈焰中。

二　从清静无为到有为的失败

经过秦末长达六年之久的社会动乱，汉高祖刘邦在长安建立起西汉王朝时，面临的是社会经济凋敝的景象。农民大量流离失所，不得耕作，甚至自卖为奴。昔日繁华的

城市一片萧条，投机商乘机哄抬物价，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卖到百金。皇帝的车子要配上四匹毛色相似的马都很困难，宰相出门也只好坐起牛车来了。

所以，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是汉前期统治者最主要的任务，陆续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如诏令从军者复员归农，并给以一定期限内免除徭役赋税的优惠待遇。又号召躲避战乱流亡在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此外，法律规定凡是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又将田赋减为三十税一，并规定了商人在生活和经营活动中的许多限制，防止他们对农民的兼并。

这些让农民休养生息的做法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自耕农民得到很大的发展，户口数明显增加，粮价也降低下来。

西汉初期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地方诸侯王享有包括铸钱币在内的经济自主权，因而对发展各自封国的经济有着较高的积极性。他们纷纷采用各种优抚政策，招募失去土地的人口来垦殖土地。许多侯国的户口迅速增长，并充分开发和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如燕、代等国，发展半农半牧的经济，长沙等国则广种水田稻谷，而据有东方的齐、吴等国，在铜矿、盐等资源上得天独厚，短短几十年间便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在实行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同时，汉代统治者也逐步完善和健全了户籍制度、租税制度和徭役制度。掌握了人口和社会财产的情况，便保证了国家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

征发。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西汉社会进入了以汉武帝时期为主的繁荣阶段。

农业的发展，是与武帝时有计划地兴修水利工程分不开的。元光六年（前129），开凿了从长安县到黄河的漕渠，全长三百余里，节省了漕运时间，又灌溉了万余顷良田。同时，又修龙首渠，将洛水引至商颜山下。由于土质松软，容易塌陷，水工发明了开井渠的办法，每隔一定距离便打一口深井，井下相通行水。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后来，又在关中郑国渠上游修六条辅渠，在泾水和渭水间修了白渠，溉田数千顷。连同关中其他的工程如灵轵渠、成国渠、漳渠等，溉田上万顷。在西北如朔方、酒泉、西河等郡，开渠引黄河水或川谷之水溉田，在汝南、九江郡引淮水，在泰山下引汶水，受益田地达数万顷。

汉武帝十分重视水利事业，元封二年（前109），发卒数万人堵黄河决口，亲临工地，命令随从官自将军以下一律和士卒一起负薪填决，终于堵塞了泛滥二十余年的决口。

铁制农具在汉代传播更加广泛，种类也很多，如犁铧就有大、中、小各种类型。辽宁辽阳出土的汉代大铁犁，宽达四十二厘米，大约是用来开沟。牛耕的方式普遍为二牛抬杠形式，这种耦犁是武帝时赵过发明的，犁地时一人牵牛、一人掌犁辕、一人扶犁，耕土、翻土、培垄可以同时完成。后来又改进了耦犁构造，不再需要人掌辕，用牛辔穿牛鼻来导引牛，又省去牵牛人，逐渐改为二牛一人的犁耕方式了。赵过还发明了改进播种方法的耧犁。

赵过根据农民的实践经验，总结了“代田法”。代田法改变了原来不分行列的缦田耕种方式，将土地开成一条条垄沟，次年耕作时又将垄与沟轮换，以调节地力，且种子播在沟中，出苗后将垄土连草一起培植苗根，既抗风，又耐旱。代田法可使亩产增加一斛至二斛以上，是古代农业耕种技术的一个很大进步。

汉武帝对新的耕种农具、新的耕作方法很注意提倡和推广，以行政命令要求各地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农官和乡里老农到首都学习新的农具使用法和耕种的方法。所以，汉代新的农业技术的普及很有成效。

以关中地区粮食产量的情况来看，汉初亩产一石半，到了西汉末年，提高到了亩产二石到三石，进步是明显的。西汉末年，人口数约为五千九百余万，垦田八百余万顷，农业经济的发展，到了极盛的程度。

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西汉社会繁荣的基础，工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全国出现了较战国时代更多的大城市，对外贸易也有了显著的进步。

西汉的手工业经营体制为官营、民营和家庭副业型三种。从汉武帝起，盐业和冶铁业被收归国有，全国设盐官和铁官，直接控制熬盐与冶铁。西汉是冶铁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冶铁技术或生产规模、产品质量，都大大超过了战国时期。从汉代冶铁遗址来看，从矿石开采到冶炼铸造已经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鼓风设备良好，有些高炉炼铁的能力已达日产一吨。除了传统的木炭外，

已经开始用煤来炼铁。炼钢技术也比较普及，有些出土的钢刀已是用铸铁固体脱炭钢制成，质量很高，以蜀郡铁官制成的蜀刀最有名。淬火技术也已发明，为了增加钢刀的坚韧和锋利性，铸造时将烧红的刀剑浸入水中。西汉后期，铁兵器和铁器基本上代替了铜器，同时，也成了周边国家最感兴趣的贸易对象。

武帝时废除各种杂钱，专铸五铢钱，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各地方私铸铜钱属于违法。这样，铸钱的权力归到中央政府，获利也是非常可观。

西汉的纺织业发展非常成熟。传统的植桑、养蚕、缫丝、织帛，是百姓最普通的家庭手工业。又有为皇室和官府需要制作精美服装的官营丝织业作坊，不仅设在长安，襄邑、临淄等地也有服官之所。其中，设在临淄的三服官负责督织皇帝冬、春、夏三季服装材料，拥有织工数千人，每年费用当然非常惊人了。1972 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发现了大量丝织品，有绢、缣、罗纱、锦、绣、绮等，花纹色泽各异，最令人称奇的是一件素纱单衣，身长一百二十八厘米，袖通长一百九十厘米，重量却仅为四十九克。随着纺织业的不断发展，织机的性能也得以不断改进，据说经营丝织业的商人陈宝光之妻，发明了一种提花机，用一百二十蹑，能够织成各式花纹的绫锦。

西汉的漆器工艺所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引人注目。设在蜀、广汉等的工官，专门督造供皇室和宫廷里使用的漆器。漆器的品种如耳杯、卮、奁、盘、壶、鼎、匣、屏风等多

种用品，以木器为胎，然后进行髹漆而成，造型美观，色泽光洁。西汉漆器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镶嵌工艺的巧妙运用，以鎏金或银扣的称金银扣器，还有嵌玳瑁、云母、红白玛瑙等，纹饰秀丽，与光亮的漆色交相辉映，绚烂夺目。由于这类漆器工艺复杂，分素工、雕工、髹工、上工、铜扣黄涂工、画工、清工、造工等多道工序，一个漆杯就得经过上百人的工作，一个漆屏风更得费万人之功了。漆器深得人们喜爱，汉人墓葬常用漆器随葬，多者达数百件。

农业产品的大大丰富，以及手工业发展带给人们的精美产品，西汉的商业在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后，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虽然汉武帝时期，试图以官商来获取更多的利润，一度对民间商业实行“算缗”、“告缗”的打击政策，大部分时期，民间商业仍是十分活跃的。各地货物顺畅地流通，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也刺激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据说汉武帝征服百越后，南方的橘柚源源流入北方市场，人们甚至到了吃厌的程度。

商业发展带动了一批商业城市的繁荣。

长安是全国的中心城市，有着皇室、贵族、官僚等大量的消费需求，又处于物产富饶的关中地区，加上西北地区和巴蜀地区同内地的贸易都通过长安，因而市区规模格外巨大。长安城有东、西市共九个，参加交易人数达数万之众。太学附近还有一个槐市，为太学生每月两次聚会交易各自风物产品及书籍乐器的地方。

此外，洛阳也是一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其地理位置

南连梁楚，东接齐鲁，是交通枢纽之地。邯郸、临淄、江陵、吴、成都等城市早在战国时便成为所在经济区的中心，著名的临淄，除了鱼、盐、漆等土特产外，尤其以精美的纺织品居于全国之冠，因而也是畅销各地的商品。广东番禺则是海外贸易的大都会，珠玑、齿（象牙）革（犀牛皮）、葛布，以及中原不易见到的热带水果如荔枝之类，都极受人们欢迎。

西汉时期的商人还积极、主动地向外寻求市场。随着汉武帝时拓展边疆的活动，陆上对外发展有四条路。一是从蓟出发，过辽西辽东，直到朝鲜半岛；一是从长安出发向西，经河西走廊，沿塔里木盆地，远抵中亚、西亚及地中海东岸。这条路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另外，还有从巴蜀出发，经西南夷到印度。最后一条从岭南番禺出发，到交趾、九真、日南（在今越南）等地。

海上交通路线则达到了日本等国。南下的航线则经马来半岛、印度，一直抵达斯里兰卡。西汉商人运去了各种丝织品和黄金器物，带回的货物有珍珠、玉璧、玛瑙、宝石等。

西汉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也越演越烈，同时，日益贫困的农民自卖为奴婢的情况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应付出现的社会经济危机，统治阶级试图以限田限奴婢的方法来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无济于事。

之后，外戚王莽先以辅政的身份摄政，进而在居摄三

年（8），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

王莽先后以度名田和推行五均六筦的措施，试图解决西汉末年尖锐的社会矛盾。然而，土地兼并的情况并没有缓和，所谓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等主要工商业城市实行市场管理的五均，以及由国家来直接掌握盐、铁、酒、铸钱等事业的六筦，也都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王莽又频频实行币制改易，所铸钱币在民间毫无信用，反而导致许多人家的破产。当这些违反经济运行规律的措施导致社会出现更大混乱时，又以残酷的收孥（nú）相坐的法律来进行镇压，混乱程度越演越烈。西汉末年，当发生灾荒时，米价暴涨至五千钱甚至万钱一石，一斤黄金只能换五升豆子，统治阶级已经到了无法再维持下来的程度，终于崩溃在绿林、赤眉农民起义中。

三 东汉经济的恢复

西汉灭亡后，汉宗室刘秀于建武元年（25）在洛阳重建政权，被称为东汉。

经历了西汉末年长期社会动乱之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广大农村十室九空，加上天灾人祸，曾经以富饶著称的中原一带，白骨蔽野，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现象。

为了恢复东汉的社会经济，刘秀在称帝之后，连续颁发了六次释放奴婢的命令，凡属王莽以来被没为奴婢而不

合西汉法律的，以及因遭战乱饥荒无法生存自卖为奴的，以及青、徐、凉、益等州被掠卖为奴的，一律恢复原先庶人身份。同时，为了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开源节流，减缓调役兴作，节省开支。并在中原也广泛采取屯田的方法，既安置了数百万计的降卒和流民，又使大量荒芜的土地开辟成良田，为恢复发展生产奠定了基础。东汉前期，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减免徭赋，给贷种子和口粮，这些赈贷贫民的做法，也利于将农民稳定在土地上。经过一个时期的恢复，农业和工商业重新得到新的发展。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表现为耕作技术的进步，以及南方经济的发展。

东汉农民的牛耕除了传统的二牛抬杠的单辕长犁外，还使用一种单牛牵引的双长辕犁和短辕犁。稻田绿肥的种植和秧苗移栽技术已发展成熟，便于中耕除草的曲柄铁锄也得到推广使用。人们还总结了关于合理密植、作物的套种和轮种方面的知识。从东汉陶田模型来看，四川已经出现在丘陵坡地上修治梯田。

东汉前期，由官府主持修复浚仪渠，共有几十万人投入治河工程，水利专家王景、王吴勘察了黄河中下游的全程地形，使河、汴分流，消除了多年的黄河水患。各地也修复或修治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充分利用水利资源，保证农业生产的丰收。

与关中一带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比较落后，西汉时期的江南尚属于地广人稀、火耕水

耨的落后状态。西汉末年中原地区的社会动乱，大量人口流亡到江南地区，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也开发了南方的广大地区。牛耕的推广，使耕作效率大增，垦殖土地成倍增长，人口也多起来，尤其在今湖南、江西一带，许多地区的人口比西汉时期增加了三到五倍。到了东汉中后期，当中原和江淮一带出现灾情时，中央政府曾数次在荆州、扬州各郡调拨赈灾粮，便充分表明这一点。江南经济的发展，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时期手工业发展成就体现在许多创造性的发明上。

官营冶铁作坊在东汉初相继得到了恢复。标志着生产技术进步的是使用了水力鼓风的装置，既节省了人力和物力，又提高了进风量，炉内温度也得以提高，所以，铸铁的质量更好了。另外，叠铸技术也更加进步了，从东汉冶铁遗址的铸件泥范来看，多层累叠，装配成套，从一个总浇口注入铁水，一次能铸几个或十几个铸件。炼钢的技术也广泛应用到铁工具和兵器的制造上。炒钢技术进一步提高。

水碓的发明，使谷物加工的效率提高了十倍。据文献记载，还出现了被称为翻车和渴乌的提水工具，从翻车的原理来看，十分接近后世龙骨水车的原理，这将在农田灌溉上发挥重要作用。在巴蜀地区，利用水利灌溉系统将池塘和水田连成一片，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制盐业，除了制作方法更为合理、效率更高外，还开发利用了天然气

煮盐。

西汉时期在砖和瓦的烧制技术上已经十分成熟，硬度接近天然石，这使建筑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同时烧窑技术的进步，应用到陶器制作上，使出现在商朝的早期瓷器变得成熟起来，东汉墓葬出土的青瓷壶、洗、杯、碗等物，质地坚硬，罩有彩色釉层，象征着瓷器的正式诞生，也意味着传统陶器工艺将经历的一场革命性飞跃。

手工业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造纸业的兴起。造纸技术出现在西汉，但真正进入实用阶段的纸张则始于东汉蔡伦的发明。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之类作原料，经过化浆、漂白等处理过程，成本低廉，书写效果理想，立即得到推广，自此，竹简、缣帛为书写材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造纸业不但成为东汉以后手工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更因为它对文化知识的传播和保存作用，被视为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东汉时期，蚕丝的产地从黄河流域传到江南、巴蜀以至西北地区，纺织业技术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除了传统的襄邑、齐锦驰名四海外，蜀锦也因其精湛的工艺闻名天下，成为经久不衰的名牌。东汉末年，马钧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织花机六十蹑简化为十二蹑，仍能控制六十余片综，效率倍增，织成图案变化多端，世人叹为观止。

商业贸易方面，繁荣的景象主要出现在社会上层，即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官僚地主阶层，真正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发展的货币经济反而衰落了，这与东汉开始逐渐发展的

地主庄园经济有很大关系。与周边地区的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通过传统的丝绸之路，向西域输出丝绸和奢侈品，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桃、胡蒜等植物自西汉起便陆续移植进来，名种马、各类奇禽异兽及名贵毛织品、香料等也源源东来。除了与日本、印度等国的商品交换仍频繁进行外，桓帝延熹九年（166）与大秦国即东罗马帝国也发生了联系，得到大秦国王安敦进献的象牙、犀角、玳瑁等礼品。

东汉的社会经济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也同时发展壮大起来。这种经济是与大土地占有制发展同步形成的，由若干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不但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还有油坊、染坊、盐工坊等手工业作坊。但在这种田庄经济内部，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农民的处境日益恶化。由于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建立在自耕农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之上，所以，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势力的膨胀，便与封建国家经济制度形成冲突，最终，引起封建国家经济的严重危机。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东汉社会在经历了恢复和发展阶段之后，出现后期社会经济的滑坡乃至再度陷入崩溃，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第五章

混沌与秩序

一　鼎足而立的三国经济

从东汉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开始，战乱频仍，愈演愈烈，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以北方地区最为惨烈。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巨大浩劫，经济文化最繁荣的中原地区变得千里萧索，人烟断绝。东汉的首都洛阳，被董卓洗劫一空，然后付之一炬，洛阳城附近二百里都遭灭绝性烧掠，洛阳城只剩下断壁残垣。连传统经济文化中心长安，也受到严重破坏，关中变成罕见人迹的荒土。人祸再加上天灾，造成北方地区人口骤减，社会经济遭到的破坏是空前的。曹操在诗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便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相对中原遭受的破坏程度而言，巴蜀和江南地区受到的波及显然要小得多。当曹魏在中原建立起政权的时候，刘备在蜀中，孙权在江南便分别与之抗衡，三国鼎立的局面正是建立在这个物质基础上的。三个政权针对各自不同的形势，积极着手恢复各自的经济，成为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主要内容。

曹魏政权据有中原及江淮地区，正是饱受战乱，灾荒、疫疾破坏最严重的北方地区。因此，发展农业生产，便是稳定社会、增强国力、争取实现一统大业最迫切的任务。当形势变得稳定起来的时候，曹魏便开始屯田。

屯田分民屯和军屯。民屯是由政府招募流亡农民，将他们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垦荒种地。屯田农民直接属于国家，由典农校尉及其下属屯田都尉管辖，收获的农作物与政府采取分成制，如用官牛的按官六民四分，用私牛则官民对分。

军屯由士兵进行生产。相对民屯来说，军屯士兵的隶属性更强一些，他们被另立户籍，称“士家”，父死子继，若兵士战死，妻子由政府配嫁，通婚仍限于士家之间。如遇战争，士家子弟则须服役打仗。

屯田的方式很快便将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起来，在经受战乱的非常形势下，效果十分明显。

屯田之外，曹魏政权还对州郡所辖地区积极招集流亡人口，督促农民垦辟土地，兴修水利。关中一带安定后，许多流亡在外的人家回本土而缺少牛、犁等生产用具，政府设法买牛、犁发给他们。在田租方面，改变汉代按收成比率征收的方法，改为每亩征四升的固定方式，农民增产不必增租。又以每户绢二匹、绵二斤的户调代替汉代口赋、算赋，以户为计算单位。这些制度，对农民归还本土、安心生产很有吸引力。

在农业技术方面，曹魏政权注意应用新的生产工具和推广新的耕种技术。灌溉用的翻车经改革后更轻便适用；西汉赵过发明的耧犁耕作技术，被带到敦煌一带加以推广，并收到很好的效果。许昌屯田区和淮水、颍水一带的屯田区推广了水稻种植，因而产量得到迅速提高。

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手工业和商业也出现了一定的起色，丝织品的花样较前有所增加。政府控制了制盐业和冶铁业，保证了战争急需的物资。城市也渐渐开始恢复了昔日的繁华。最根本的是，农业经济的恢复，关中一带，原先千里无鸡鸣的中原地区，变成“鸡犬之声，阡陌相属”，这为曹魏日后统一天下，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蜀汉政权控制的益州地区未曾受到中原战乱的直接影响，因而在发展经济上以扶植和发展州郡的农业经济为主。为了保证农业丰收，实际治理国家的诸葛亮十分注意水利灌溉事业，如为了维护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工程，特意征丁一千二百人，可见其对水利设施的重视程度。因此，蜀汉的农业一直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工商业也呈现繁荣的景象。政府直接掌握了获利最多的盐铁生产部门，不仅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还增加了财政收入。织锦业经过汉代的发展，产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蜀锦驰名全国，成为政府军费的一大来源。此外，蜀中出产的漆器、铜器因其制作精美，也成为与其他地区，主要是吴国贸易交往的商品之一。蜀都成都成为西南地区繁荣的商业中心，万商云集，店铺林立，货源充足，且集中了许多奇珍异品。

与曹魏和孙吴相比，蜀汉的经济实力最弱，这是因为它主要统治区域不过是巴蜀和汉中地区，人口也不到一百万。三国之中，蜀国最先灭亡，并非偶然的。

孙吴所据有的江东，主要在江南地区，包括赣江流域和后来重新占领的荆州等地。西汉以来，中原地区躲避战

乱而迁居江南地区的人口渐渐多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到了南方。但就广大的江南地区整体而言，依然还是相对落后的状态。在吴国的军事压力下，原先居住在山里的山越人出山，成为国家编户，其中丁壮便有四万人补入军队。山越人出山加速了东南地区的经济开发。

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孙吴政权也推行屯田制度，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沿着长江，屯田据点连绵不断，东西几千里之间，形成一条防线。屯田所得粮食，为孙吴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

孙吴的手工业主要有绩麻、炼铜、铸铁等，而比较有特点的则是制瓷业和造船业。制瓷主要是从釉陶发展到东汉时出现的青瓷业，此时青瓷技术发展已经非常成熟，成为吴国的著名特产，从一些出土的瓷器来看，造型非常精美，釉色也从早期的薄而呈淡绿带黄色发展到施釉较厚，色泽较深。

为了适应水战和江海上交通的需要，孙吴统治者大力发展造船业。据说今天福建闽侯的侯官是当时最大的造船中心，此外，还有浙江临海和广东番禺。据记载当时在长江中的大船有些高达上下五层，大的长二十丈，有些能容纳三千人，载重量达五百吨。海船北航辽东，南下南海，孙吴还曾派遣一支万人船队航行到台湾岛。此外，与南方交趾的经济联系也很密切。

魏、蜀、吴三国在各自统治区域里恢复和发展经济，使三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从东汉末年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应

该说是一个进步。事实上，三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并没有中断，比如蜀锦向魏、吴两国的输出，为蜀汉筹集军费的一大来源；孙吴以海外贸易所获的香料、珠宝、象牙、玳瑁等奇货，来与魏、蜀换取马匹、织锦。所以，当三国之间力量的均衡被打破时，重新走向统一的西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　十六国北朝的经济

三国归为西晋的统一，使中国重新出现南北统一的局面。西晋时人口数达到一千六百余万，比三国时期人口总数高出一倍，这个数字反映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封建国家力量的加强。

三国时期实行的屯田制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公元280年，西晋颁布了占田制和户调制，试图通过田租和户调的调整，使农民与土地结合在一起，保持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占田制规定，农民男子每人占田数为七十亩，女子为三十亩；又有农民应负担田租的课田，男子五十亩，女子二十亩。户调制规定，丁男之户，每年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或次丁男为户者折半交纳。实际征收时，是将纳租调户按贫富分成九等，按等定数，而平均指标则须与户调制所定数额相等。

西晋虽然是一个短暂的王朝，这种“九品混通”的征

收租调办法，却为南北朝统治者大致上一脉相承地沿袭下来了。

公元316年，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内乱，西晋王朝灭亡了，中原地区再度陷入混乱无序状态。从匈奴将领刘渊建立的后汉政权开始，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地区的一百三十余年中，主要由匈奴、羯、氐、羌、鲜卑五个少数族上层贵族所建的十六个政权（其实并不止十六个）先后出现在北方地区。这是我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经济遭受破坏最严重，因而人民苦难也最深重的时代。战乱、灾荒，加上种族之间的仇杀，人口大量减少。后赵末年，关中蝗灾严重，草木禾苗全被吃光，牛马无所食，互相把毛都啃光了。前秦末，长安大饥，人相食，路上随处可见饿死的人。军队之间作战，甚至严重到靠杀人以吃其肉来充饥的地步。

因此，十六国时期是古代史上生产遭到大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低潮阶段。

当社会处于动荡不安，到处驰骋着掳掠屠杀铁骑的时候，人们为了求得生存，纷纷结坞自保。坞就是设防的田庄，又称壁、堡等。坞堡其实就是一个或数个大田庄，由大族地主任坞主，除了谷物桑麻之外，还种植蔬果、豢养鸡豚、栽培竹木，自办樵蔬脂烛，除了食盐之外，基本生活资料都能做到自给自足。因此，坞堡经济能够适应十六国时期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交换经济发生中断的环境。坞堡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抵御胡人贵族的侵犯，遇有战事，

便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反击。坞堡的宗主通常是豪强大族，堡户往往便是他的宗族、乡党、姻亲、故旧、宾客、部曲，同宗主保持很强的依附关系。坞堡拥有的户数多则数千，少则千家，实际上就是豪强大地主的佃客。北方地区这种坞堡比比皆是，成为战乱时期地主与封建依附农民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拓跋部的后裔，通过一系列的征服和掠夺战争，建立起了拓跋王朝。一次掠夺战争的胜利，常常可以获得人口数十万，牲畜上百万头，至于府库珍宝、车骑器物更是不可胜计。这种掠夺经济奠定了北魏前期的经济基础，并使北魏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奴隶人口。

随着北魏社会的发展，中原先进的文化逐渐被接受，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定居农业和手工业也在发展。当北魏在中原的统治逐渐趋于稳定的时候，发展农业生产，便成为如何建立稳定政治统治基础首待解决的问题。

北魏政府在中原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宗主督护制问题，即大量人口依附于坞堡宗主而不直接向国家交纳租税；赋税苛重且十分混乱的现象；鲜卑贵族以及汉族地主的大土地兼并问题。针对上述现象，为了使农民得到一定的土地，从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发布了均田令。均田令规定：

（1）十五岁以上男子受露田（只种谷物）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女受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以备休耕，七十岁后还官。桑田为永业田，不须缴还。家

中原有私田不动，然应用以抵消应受桑田及倍田份额。不宜栽桑地区，男子给麻田十亩，妇女五亩。

(2) 露田不得买卖。原有桑田逾二十亩者，超过部分可出卖，不足者可买至二十亩。

(3) 地主可按奴婢和耕牛数另外受田。奴婢受田数同农民，耕牛每头三十亩。

(4) 土地不足处，农民可迁移到空荒处。如民有余力，还可暂借土地超额使用。

(5) 地方守宰按职位高低受田，刺史十五顷，县令郡丞六顷。授得之田不许买卖。

又以三长制取代了一度被承认合法的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即将民户按五户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的形式编制起来，设邻、里、党三长各一人，负责检查户口，征发租调力役。

与此相应，制定了新的租调法，规定一夫一妇出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或耕牛二十头，其租调数量同一夫一妇。

均田制的实行，意味着农业生产从此在北魏经济生活中占据了决定性的位置。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可耕地，同时，又保证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性，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这一制度，后来被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继承和发展，显示了它的深远影响。

北魏后期，水利灌溉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其较著者如崔亮在洛阳修汴、蔡二渠，卢洪在范阳修复旧督亢陂等，

修整了旧有的水利设施，大面积地提高了单位亩产量。北魏后期，仓储粮食增多，凡州镇要地、漕运沿线及京师，都置官仓，丰年籴（dí）积，灾年出粜（tiào）。同时，在耕种技术上也有了发展，如根据土壤的湿度进行耕作的技术，种子的处理技术，果树栽培与嫁接等，反映北魏的农业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稻谷亩产量也超过了汉代的水平。

北魏的手工业中，比较有特色的是毛纺织业，其产品有以羊毛、木皮、野蚕丝混合型的，主要是毡。毡可用在制衣、靴垫等业，也可用来做帐篷。据说当时曾有能容纳上千人的大毡帐，由此可见北魏毛纺织业的发展水平。

随着中原地区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商业经济再现活跃的局面，城市经济也得到复兴。北魏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邺城（今河南安阳）、长安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并达到了相当的繁华程度。对外贸易一方面恢复了传统的与西域地区的贸易，其经商范围远及波斯和大秦，西域商人以金银珠玉、珍奇物器等奢侈品，来换取中国的丝织品。另一方面则是与南朝的南北互市。南方物产丰富，手工业品也十分精美。虽然受到双方政治、军事关系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南北互市依然十分兴盛。

北魏末年发生了内乱，之后，分裂为东魏（都邺城）和西魏（都长安）两个政权，后来，又分别为北齐和北周取代，这样，北方便出现了两个对立政权并立的局面。

西魏、北周的经济力量相对东魏、北齐来说比较薄弱，但是，西魏自建国起便不断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革和调

整。如制定旨在益国利民，提高行政效率的“中兴永式”三十六条，为经济发展创立了良好的环境。又建立“计账”和户籍制度，意在均平百姓赋役负担，保证政府财政收入。北周建立后，周武帝又连续进行了几项改革，如释放奴婢、杂户等，最著名的则是铲除寺院经济。北魏后期，佛教兴盛，寺院多达三万余所，僧侣达二百多万人。寺院除了房产外，还占有大量良田，以及专为寺院服杂役和种田输粟的佛图户、僧祇（qí）户。为了富国强兵，周武帝决心将僧侣地主占有的劳动力夺取过来，两次诏令灭佛，没收了北周境内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收为国家财产。数百万的佛教徒或充兵，或为编户从事生产活动，这样，大大充实了国力。同时，周武帝十分注意发展生产，在修复旧有水利工程等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国力终于由弱变强，奠定了以后隋朝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

三 江南经济的开发

公元317年，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立国，史称东晋。公元420年，刘裕代晋，改国号宋，之后，又经历了齐、梁、陈三个政权的更迭，直到公元589年被隋军灭亡。这段历史被人们称为南朝。

此前，西汉和东汉末年，北方人民曾两度避乱南下，对江南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西晋末到十六

国时期，北方地区的混乱，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汉末，因而北方流民的南下规模，也超过以往。据估计，南下江淮以南者，大约接近一百万人。正是流民的南下，为南方的生产带来了生力军，使江南经济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东晋南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经常颁诏令要求地方官对农民善加劝导，做到地无遗利，耕田养蚕，各尽其力。同时，地方官在推广新的农具和新的耕作技术时，也比较注意实际效果。东晋以前，江南仍有相当部分地区是采用火耕水耨（nòu）的方法进行粗放、原始的经营，此后，基本上普及了铁犁和牛耕。为了提醒和鼓励人们对耕牛的重视，南朝宋孝武帝和明帝在每年春耕之前，都下诏令禁止杀牛。

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灌溉工程的恢复和兴修，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也提高了，较好的稻田亩产量平均十斛左右，较东汉时平均三斛增加许多，因而不但公家储备有大量粮食，士庶地主之家通常也有许多粮食储备。粮食的品种也多了，稻麦之外，还有黍、粟、菽及其他杂谷。豆麦本是北方地区作物，此时在江南得以普及，有利于土地的充分利用，也与北方流民南下后的积极推广有关。西汉时北方地区推广的区种法，是一种精耕细作的耕作方法，通过深耕细作，肥水充足，便可使产量大幅度增长，此时也在南方得到普及。

江南的土地占有形式有三种，一是个体农民，二是国家公田，三是地主的园墅。所谓园墅，是官僚地主占有了

大量土地和山泽之后，经营建设的既具有观赏价值，同时又具有经济价值的产业。大的园墅，占有大片的水陆地供养殖和种植，田间小路纵横交错，渠水像经脉那样时散时合，稻子扬花时，空气中充满了清香。如有高岗和陆地，再种上菽、麦、粟、麻，更加丰富多彩了。园墅里种植的作物种类很多，如果树便有杏、栗、桃、李、梨、枣、枇杷、柿子等，百果备列。甚至还种植了一些药用的菊花、天门冬、附子、乌头、茯苓、卷柏之类。从园墅经济的情况来看，农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江南地区除了修复水利工程之外，还出现一种湖田，即通过筑堰围湖，排水成田，旱涝皆能保收，而且产量非常高。湖田出现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和会稽郡一带，是南方农民在实践中的发明、创造。据史书记载，由于稻米产量较高，一个地区获得丰收的话，便可“数郡忘饥”了。因此，南方原先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情景有了很大的改观。

东晋南朝时期手工业中，以冶铸钢铁、瓷器制作和造纸业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

从冶炼技术来说，东汉以来的水力鼓风冶铸，已经普遍应用到冶铸业。据梁陶弘景记载，有一种“杂炼生糅”的炼钢方法，将生铁与熟铁一起放入炉中冶炼，由于生铁熔点较低，渗入熟铁中，再反复锤炼，便能逐渐去掉铁中杂质，制成钢铁。这种钢成本较低，除打造刀剑外，也可打造农具，如镰刀之类，对发展生产影响很大。南朝著名

的制兵器的地方在会稽郡剡县的三白山，出现了如谢平这样名闻天下的炼钢制剑高手。江夏（今湖北武昌）的冶唐山出产丰富的铁矿，也是冶铸兵器农具的主要场所。梁武帝时，为了放水淹驻在寿阳的魏军，曾在淮水上塞浮山堰，将京城中所存放的数千万斤铁器倒入河中。由此看来，铁的冶铸规模是非常巨大的。

三国时期的制瓷技术已经成熟，东晋以后，制瓷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众文士作诗赋，常常把茶、酒与瓷相提并论，反映瓷器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非常普遍。南朝士大夫讲究饮茶，瓷制茶具的制作因此得到很大推动。青瓷是南方瓷器的代表，胎质灰白细密，早期釉呈青色或淡青色，后来的青瓷往往染有酱色釉彩斑。

青瓷制品种类繁多，日常生活中钵、盂、壶、罐、盘、碗、灯、熏炉等都有发现。另外，随葬的明器也有大量青瓷制品，如人俑、动物俑、仓、灶、猪圈、鸡舍、杵臼、米筛、畚箕等，制作非常精巧。

青瓷制造以会稽最为有名，被称作越窑。其他重要的产地如萧山的上董、德清的戴家山等。

自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造纸技术发展很快，不仅产量增加了，纸的质量也大大提高了。南朝著名的造纸业重镇剡溪一带，四五百里盛产藤，人们取藤皮造纸，质地极佳，成为著名的产品，直到唐代，人们仍以藏有藤纸相夸。造纸术的进步，表现在纸面平整光滑、洁白精美。时人有撰诗赞颂说：“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人们还

常常用颜料将纸染成青、红、绿、桃花纸，非常受欢迎。为了防虫蛀，还将制成的白纸放在黄蘖（bò）药液中浸过，制成黄纸，专门用来抄写书籍、经卷及其他需要长久保存的档案材料如户籍等。王羲之任会稽太守，谢安向他要纸，王羲之便从库存中取九万张纸送给谢安。纸的生产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开发，南方的商业也开始活跃起来。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动脉，长江沿岸的江陵、夏口（今湖北武汉）、建康、京口（今江苏镇江）因为是主要的商品集散的城市，很快繁荣起来。从三国孙吴政权到东晋南朝，建康一直是南方政治和经济中心，发展速度更是惊人，东晋时人户尚只有四万，到了梁武帝时，便发展到二十八万户，估计人口在一百万上下了。建康城中设有大市、小市等四个市场，城内居民住宅、店铺、市场连绵成片，与两汉繁荣时期的长安、洛阳不相上下。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证财政收入，官府十分重视市场管理，要求商人分别按照铜街、铁市、葱肆、鱼市等规定设摊，不可随意打乱。同时，按照市税、交易税、关税等形式征收商税。市税又称市租，因为开设店铺或摊点需占用一定场所；交易税又称估税，是根据交易内容和数量按比例抽取的。关税又称关津航埭税，显然由于南方货物运输，陆路之外，水上航行是很重要的形式。公元404年，建康城遭受一次风灾，被毁坏的船只竟有上万艘，可见当时水运事业的发达，也说明商业活动是如何的兴盛。

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有日常生活所用的衣食类，如各种粮食、食盐、水产、肉类、蔬菜，以及纺织品、衣帽鞋类等，也有其他生活用品如葵扇、簟席、文具书籍、陶瓷器皿、草药、剪刀针线等。还有一些供贵族官僚人家享用的奢侈品，如南方的特产甚至从海外进口的香料、珍珠、象牙、犀角、翡翠、珊瑚、玳瑁等。对这些奢侈品的追求，成了当时与海外贸易往来的主要内容，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对外贸易仍出现逐步扩大的趋势，与之交往的国家，最远达到地中海沿岸的欧亚地区。

在参与商业活动的人们中，传统的官商、私商和农民依然是人数最多的组成部分。与江南地区士族地主的大土地经营同时存在的，便是贵族官僚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占有广大山林川泽的贵族官僚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园墅，园中种植的经济作物如果蔬、药材，便成了他们经营的内容。他们与商贩展开激烈的竞争，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在果子未成熟时便先行摘下上市，以致最后不得不由皇帝出面干预，禁止采择未熟果品出售。身为三公高官的沈庆之，经营田园之业，拥有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一次向政府捐钱千万，谷万斛，资产是非常惊人的。

贵族官僚经商往往还利用自己的特权，获得厚利。最常见的是乘在地方任官的便利，贩运当地的土特产易地出售。如谢安的同乡在广东做官，回建康时带回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后，建康人争相效仿，高价出售后获利数倍。又如孔道成从会稽到建康，随行带了十多船的绵绢纸

席，准备到建康后出售。由于广州是与海外贸易的重要关口，到广州做官，便是贵族官僚致富的捷径，俗话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的说法，可说是鞭辟入里的揭露。

贵族官僚积极参与商业活动，暴露了他们的私欲，还产生了钱权结合进行交易的弊端，但也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市场的活力。

第六章

再现雄风

一　昙花一现的隋朝繁荣

公元589年，隋军渡过长江，一举攻下建康，腐朽的陈朝统治宣告结束。在经历了二百余年南北分裂局面之后，中国重新进入一个统一的新阶段。

早在隋文帝杨坚取北周而代之以后，便着手在政治、经济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确立中央三省六部制，建立科举制度等，经济上则继续推行北魏均田制，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又减轻了农民承担的赋役，采取轻税入官的措施，目的是争取民心，同时也将更多的农民转为国家控制下的纳税农民，这对抑制地方士族势力，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都是积极有效的。

隋文帝时还十分注意兴修水利建设工程，较大的工程如引渭水直达潼关的广通渠，漕运三百里，兼有沿途灌溉的意义。地方上的水利设施就更多了，这对促进农业生产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为了解决积粮防灾的问题，设置了许多官仓和义仓，官仓较大的如卫州黎阳仓、洛州河阳仓、陕州常平仓和华州的广通仓，用以保证长安的粮食供应，同时，又可作为储备灾荒年所用。义仓则是要求地方自筹粮食，就地造仓储存，以解决受灾年之用。隋初经济十分稳定，据说储存在仓窖中的粟帛，数量十分惊人，甚

至说可供五六十年之用，这也许有些夸大，然库藏之多，前所未有。

隋文帝又下令统一南北朝时各地自行制的钱币和度量衡制度，新铸一种质地好、分量足的五铢钱，每一千钱规定重四斤二两，通行全国，废止了旧行的各式铜钱。又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度量衡的统一，有利于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百多年来，一直处于发展迟缓，甚至常常因社会动乱而出现倒退的社会经济，在统一以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

隋朝经济建设方面比较突出的成就是城市的营建和大运河的开通。隋文帝建国后，感到北周沿用的长安城规模过于狭小，便在旧城长安东南约七公里处的渭水南岸兴建了大兴城。大兴城的面积约为八十四平方公里，城东、南、西各开三门，北面开一门。其中，宫城为皇室所居处，皇城为官府所在地，二者都位于城北部中心区。宫城和皇城的东、南、西三面，分列一百零六个居民区——坊，其中，也包括官吏府第和寺观庙宇。城东和城西各设一市，为民间商品交易场所。全城被纵横二十五条大街分开，而通向城门的六条主干大街，最宽竟达一百五十米。

各坊四周垒建起围墙，坊门到了夜间便关闭起来。坊内又建有街巷，将居民的屋舍划分开来。城里的供水，则由水渠将浐水和藻河水引入城内。

大兴城的设计改变了西周以来的旧城市营建格局，并

且较多地考虑到居民在交通、用水、商品交易活动等日常需要，是古代城市营建史上发展比较成熟的都市代表。其规模之巨大，也是古代世界罕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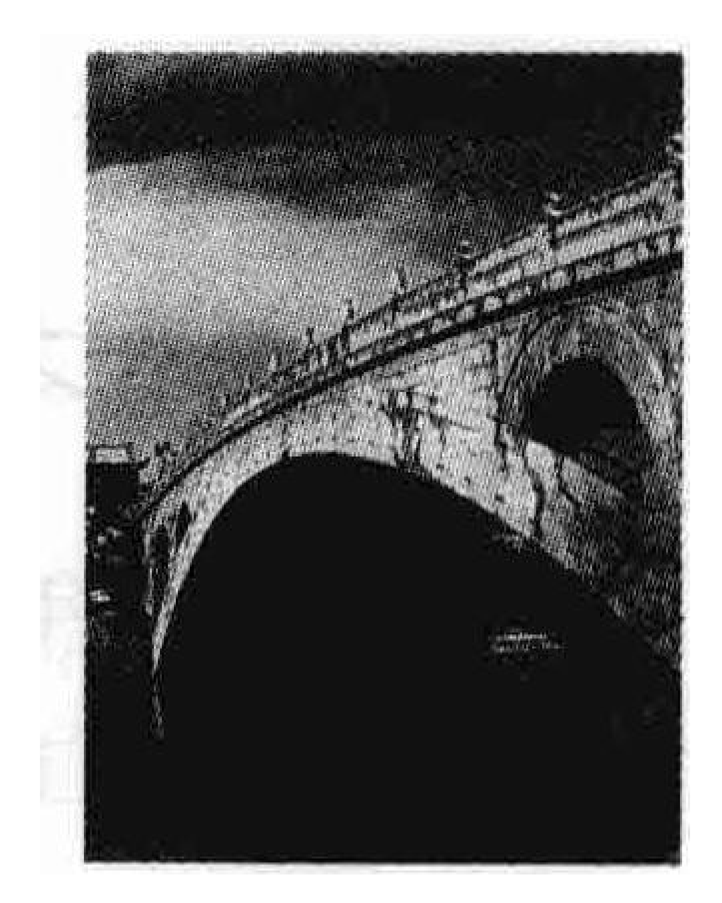
由于大兴城距关东地区较远，物资调运不便，当隋炀帝于公元604年即位后，便决定迁都洛阳。经过十个月的时间，初步建成。

洛阳城亦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以洛水为界，城南有九十六坊，城北有三十六坊。又设有丰都市、大同市和通远市三个市场。洛阳建城后，隋炀帝又下令迁徙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及河北诸郡的工艺户数千家到洛阳，使这座重新修建的故都很快繁荣起来。从洛阳三市的规模来看，通远市共设有二十门，分路进市，市东是漕渠，数以万计的船只泊在两岸；丰都市设十二门，市内按商品种类性质分作一百二十行，三千余家铺面，全部安置在整齐划一的建筑里。市内沿街种植了许多榆树、柳树，绿阴蔽地。市内四边则为延展的楼阁，设有四百余家商店。隋炀帝曾许可胡商入丰都市交易，事先命令整饬店肆，酒食店邀胡商饮食亦不准收钱，还将彩色丝帛缠在树上用以装点繁华，暴露了统治者之豪侈和虚荣心理，也反映了当年洛阳商业繁华景象的一个侧面。

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也为了便于南方丰富物产转运到洛阳和北方地区，隋炀帝下令开凿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来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全长四千多里，竣工后，西抵长安、北达涿郡、南至余杭，沟

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规划严密，布局合理，在世界水运史上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对隋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我们从隋朝著名的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安济桥，看到隋手工业技术水平发展的高度。这座跨度为三十七点三七米的单拱大弧券桥，全长五十余米，全部用石料砌成。在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之后，赵州桥仍然屹立在洨（xiáo）河上，雄伟壮丽，成为今天世界现存最古老的跨大弧平的石拱桥，在中外桥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李春设计的赵州桥

能工巧匠的成就既显示了他们非凡的智慧和技术，也使后人对当时社会的综合国力以及手工业发展有了感性上的认识。

如曾两次主持营建都城和部分运河开凿工程的著名设计师宇文恺，还擅长机械装置方面的设计。他为隋炀帝制造的风行殿是一座可以拆卸也可以行走的活动宫殿，可容纳数百人，供皇帝巡行边境时用。另一位巧匠何稠造的六合城，是一座周长八里、高十米的活动城，隋炀帝攻高丽时，曾在一夜之间搭成此城，城上布满甲士，遍插旌旗，令对方惊奇不已，叹为神功。

隋朝虽然在较短的时间里便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并为后来唐朝的繁荣打下基础，社会也呈现出短暂繁荣的景

象，但统治者穷奢极欲，又为了炫耀武功而数度征战，很快耗尽了民力。无休止的徭役和兵役，使千百万农民家破人亡，最终酿成了农民起义，隋朝统治随之灭亡，社会经济重新陷入凋弊、残破的境地。

二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公元618年，李渊、李世民父子趁隋末农民起义的浪潮，建立了唐王朝。隋朝灭亡的教训，给唐太宗李世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人民如同浮舟之水，既能载舟，又能覆舟。所以，他执政时期，十分注意协调各阶层利益，缓和社会矛盾，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据人们描绘这段时期社会的升平气象，米不过四五钱一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旅即使到了晚上借宿在野外，也保证安全无事。社会经济从恢复阶段开始向新的繁荣高潮发展，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贞观之治”。

均田制的推行是唐初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动力。从均田制颁行的内容来看，尽管实际执行过程中许多地区无法达到均田令所说每个丁男受田一百亩的标准，贵族官僚在占田上也不可避免地享有许多特权，但是，北方地区因为战乱而出现的大量荒芜田地，都分配到农民手中，江淮流域和江南地区人口密度相对小一些，也基本上能够按规定授田。从总的情况来看，自北魏推行均田制以来，唐代推

行实施的情况最好，农民有田可耕种，政府以租庸调形式保证了国家收入的稳定来源，为经济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唐朝前期，广大农民在生产劳动中，还总结、发明了新的生产工具，如曲辕犁、筒车等，提高了生产效率。曲辕犁最初出现在江南，由十一个部件构成，除了将原来的直辕改成曲辕外，还增装了犁评和犁壁，这样，操作时通过调节犁评，便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需要；犁壁又可将翻起的土推向一边，减少阻力；曲辕则使人们在使用时便于掌握。筒车是一种新型水车，形制因地而异，蜀中多竹，四川地区的筒车便是将短竹筒装在类似纺车的大圆盘上，圆盘旋转，竹筒在低处舀水，至高处泻水；有些地方则是用木桶。唐初出现的筒车，其灌溉功效远远高于传统的桔槔，也比翻车、辘轳的效果好。小农具方面，如用于耙地的铁搭、疏通田泥的耖（chào）等，这些工具的出现，意味着农民，尤其是南方农民在土壤耕作技术方面发展更为成熟。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推广，标志着唐代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唐代农田水利事业很发达。全国各地都兴建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有些是缘旧渠重新疏浚，有些是新修建的。大的工程开渠引水后，受益田上万顷，小的也有数十顷。与前代相比，唐代对水利事业的管理十分重视，不仅尚书省设水部郎中主管此事，还制定了严密的水利灌溉法规——水部式，对如何设置斗门，如何掌握放水时间，如何分配水量，如

何对灌溉用渠进行维修、养护等内容，都有十分具体的规定。水部式对减少用水纠纷，提高用水效率，保障生产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从唐代耕种技术发展的情况来看，不少地区农民越来越讲究精耕细作，南方地区两年三熟制已经十分普遍，部分北方地区也出现了两年三熟的耕作体系。单位亩产量一般在二石左右，较汉代有明显增加，产量最高的地区，个别达到亩产十石左右。

农业的发展，使物价从开元十三年（725）到天宝年间，数十年一直保持稳定，长安、洛阳的米价为每斗十五文到二十文上下，绢价也一直保持在二百文左右一匹。1971年，人们对洛阳唐代含嘉仓进行发掘，这座东西长约六百米、南北长约七百余米的仓城内，密集排列着四百多个粮窖，粮窖口径大的十八点五米，小的八米，最深的距地表约十二米。据此估算，大窖可藏粮食一万余石，小窖藏数千石，全仓储粮约五六百万石，与史书记载相合。唐朝储粮时，还将储粮时间、品种、数量、来源一一刻在铭砖上。从铭砖记载情况来看，南方楚州、苏州、滁州，北方沧州、邢州、德州等各地粮食都有，入库时间多为唐前期，为唐朝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正是在雄厚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唐王朝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极盛，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唐代手工业中，丝织业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唐以前，养蚕业、缫丝技术和丝织技术一直是北方地区优

于南方，据说唐初薛兼训任江东节度使时，看到浙东农村这些落后的情况后，便命令军中未婚的北方籍青年，回到家乡，挑选善于缫丝及丝织工艺的姑娘为妻，然后带回南方。从此，江南地区的丝织技术果然有了很大提高，并迅速得到推广和普及。

绢是百姓向官府交纳的租庸调的一部分内容，因而是家家不可缺少的手工业生产。当时认为宋州（今河南商丘）和亳州（今安徽亳县）所产的绢最好。此外，益州（今四川成都）的蜀锦仍然享有旧日的盛誉。不出蚕丝的地方则种麻，以麻织品代绢。

绢的显著特点是轻。据古书记载，当时有一种轻绢，长四丈，重量却只有半两。前些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墓中，发现丝织品多种，从颜色来看，红色有水红、猩红、绛红、银红、绛紫五种，黄有鹅黄、菊黄、杏黄、金黄、土黄、茶褐六种，色彩极为丰富。唐诗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形容丝织品的美丽色彩，如“染作江南春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画裙双凤郁金香”等，写出了这些色彩的动人之处。

丝织技术也出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精湛技艺。如安乐公主一件用百鸟毛织成的裙子，据说正看是一色，反看又是一色，放在日光下和晚上用灯火看也明显不同，还将百鸟形状都织在裙子上。民间还发明了蜡染、绞缬（xié）等染色方法，使绢帛具有各种精细、美丽的花纹。

制瓷业是唐朝手工业部门中另一种具代表性的行业。

瓷器生产到了唐朝已经发展成熟，北方的河北、陕西，南到广东、福建，都有瓷窑。瓷器的品种主要有白瓷和青瓷两大类。白瓷胎质坚硬，釉色洁白，人们用胜似霜雪来加以形容。青瓷器以南方越州最具特色，南方诸州如洪州（今江西南昌）、鼎州（今湖南常德）等地的瓷窑也以生产青瓷为主。青瓷瓷土细腻，胎质薄，釉色晶莹润泽，人们用千峰翠色来形容其釉色可爱，以轻巧如云比喻其质地精良。陶瓷工艺的另一项新成就是被称为唐三彩的工艺美术品种，即在制成的陶俑坯上涂以不同成色金属原料的色釉，烧制后便出现黄、绿、褐、蓝、白等彩色。唐三彩的出现，表明唐代陶瓷工匠对化学原料特性的认识，以及釉色调制、窑温控制，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唐前期商业也迅速繁荣起来。同时，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海外贸易的再度兴起和发展，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原先的中心城市更加繁华，还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其中，因运河而面貌得以显著改变的是扬州、杭州，扬州被形容为“十里长街市井连”。运河沿岸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汴州（今河南开封）及荆州（今湖北江陵）、盐官（今浙江海宁）也都是著名的城市。据统计，唐朝城镇总数达到一千个以上。

长安是唐朝的都城，唐前期时在隋朝营建的规模和布局上又加以扩充加工，到了唐朝鼎盛时期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呈现出极其繁荣的景象。

长安城外廓城有十二条南北大街和十四条东西大街，

将全城分为一百零八个坊。每坊长宽各三百步，四周围以垒墙，居民及官吏的宅第遍布其间。长安城的商品交易场所分东西两市，坐落在皇城外的东南和西南。市的四面各开两门，中间遍布商肆，并设有官府进行管理的官衙。按照商品种类、特点，分成绢行、装饰品行、秤行、果子铺、鞍辔行、药行、金银行等。当时，无论是贵族、官僚阶层享用的毡毯、绫锦、锦袍、金银器、铜镜、药材等价值比较昂贵的商品，还是毛织品、麻制品、金属制品、木器、盐、茶、酒、纸、粮食等日用消费品，都在市场上有频繁的交易。随着商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资本雄厚、富可敌国的巨商，如唐玄宗时的富商王元宝，当玄宗问他有多少家财时，他答道："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

开元、天宝年间的唐朝不仅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文化也极为繁荣，所以，以它鼎盛的风姿，在世界各国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并吸引了许多周边邻国以及海外国家的使者、商人前来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诸多对外联系的海上或陆路通道中，最著名的仍是横贯亚洲的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的起点是长安西门，经过河西走廊或塔里木河北面通道，越过葱岭，向西一直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达东罗马帝国各地。沿着这条通道，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茶叶、铜器、铁器和其他土特产品源源不断输出，输入的商品则有马匹、香料、药材、宝石、木棉、玛瑙等。西域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国早就与唐朝的使者往

来不绝，此时交流更为广泛。波斯（今伊朗）和大食（今阿拉伯）是中亚主要国家，与唐朝的关系也很密切。在唐朝许多城市都活跃着做生意的波斯人的身影，波斯人酿造的名酒三勒浆在长安、扬州等地也有出售。在长安一些出售西域人酿造的葡萄酒的地方，人们还可看到翩然起舞的胡姬。

此外，南方的海港城市泉州、广州以及扬州也停泊着许多从海路来华的各国贸易船只，包括来自东南亚的林邑、真腊、狮子国（锡兰）、印度、昆仑（非洲诸国）及许多阿拉伯地区国家。他们带来的商品中，除了宝石、香料、狮子、驼鸟、药品等之外，石榴、胡桃、胡麻、菠菜等菜蔬瓜果也由波斯输入中国。而原来一直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的高丽、新罗、百济等朝鲜半岛国家和日本等国，与唐朝的经济上的联系更多了。他们的使者从唐朝不仅运载了大量丝织品、瓷器等回国交易，连唐朝的都城营建形式，经济方面实行租庸调制的具体内容，饮食风俗、服饰、建筑等都带了回去，对这些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使盛唐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典范。

三 盛极而衰的唐后期经济

“渔阳鼙鼓动地来”。天宝十四年发生的安史之乱，经

过八年征战，终于结束，唐王朝也经历了由盛向衰的转折点。由于在平定叛乱期间增设了许多节度使，各自据有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势力，而唐代社会经济固有的内在矛盾渐趋尖锐化。所以，安史之乱在北方地区造成的破坏虽然非常严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还是得以再现繁荣的景象，而均田制的破坏，漕运的衰落，却显示了唐朝经济开始走向衰败的必然命运。

均田制是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经济繁荣的基础，到唐代中叶，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原因是，均田制实行到后来，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放松了。随着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兴旺发达，商品经济空前繁荣，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势必被打破，从而促使了土地的私有化和商品化的发展。这使得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带有深刻的必然性，尽管政府数次诏令禁止土地买卖，最终都成一纸空文。统治阶层中贵族、官僚、地主本身就是兼并土地的主力。唐代佛教兴盛，在皇帝的许可下，寺院也成为占田和兼并土地的重要力量。此外，经济的繁荣，人口的迅速增加，到天宝年间，户口数已为唐初近三倍，政府掌握的公田日益枯竭，均田制继续推行的物质前提不复存在了。

均田制的名存实亡，国家借以维持的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以两税法来代替租庸调制，均田制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户籍确定纳税等级，按照等级的不同，来征收相应不同的实物如米麦若干、绢布若干。

户等是按照田地数和资产来确定的，每三年核定一次。所以，纳税额与男丁多少已没有什么联系，这意味着对农民人身控制有所放松；战国以来通行的力役为主的赋税形态也变为以实物为主的赋税形态，这些都是唐朝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体现在赋税制度上的进步。

两税法颁行，使唐王朝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

北方社会经济在安史之乱中破坏十分严重，南方则比较安定，因而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从人口户数来看，唐后期南方州郡户数增加较多，增加部分中大部分是北方迁来的。这使劳动力也大为增加。此外，南方水利资源较丰富，唐后期陆续在江南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各地的粮食生产都有了很大增长。在唐代的粮食消费中，越来越依靠南方生产的稻米，这表明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倾向于南方。

南方地区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丝织业本来是北方地区的主要家庭手工业，河北定州一带是传统的丝织品产量和品种最负盛名的地方。到了唐代后期，江淮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丝织品的生产明显超过北方，跃为全国之冠。最突出的是越州（今浙江绍兴），唐前期尚因为缺少缫丝和丝织人手在这方面默默无闻，此时却以贡献长安数十种精致的丝织品令人惊叹。宣州工匠用丝头线织出毯子，又软又暖，兼锦褥和毛毯之长。蜀锦的制作，也更加绚丽精致。

造船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扬子县的官办造船工场，载重量达一千石，民间造船工场甚至有造出载重达八千石的

巨型船舶。长江和运河的漕运业兴旺，故江南一带，大船非常多。许多富商便拥有若干大船，载运各地特产，南来北往，获取厚利。据说还有一位叫李皋的人，苦心设计出用脚踏为动力的轮船，踩起来如同挂了帆席顺风而驶一般便利。

唐代造纸技术非常普及，各地都有自己的名品，如越之剡藤、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等，宋州和亳州间出产一种被称为乌丝栏、朱丝栏的名纸，非常受人欢迎。蜀纸中薛涛笺制作最为精致，取百花潭水制成深红小彩笺。纸的种类还分作写字用、包茶叶用、糊窗户用，用途不一，质地也各有区别。

瓷器已在民间普遍使用。越州的青瓷被嗜好饮茶的陆羽在《茶经》中推为天下第一，认为其质地像冰玉般，非北方的邢瓷可比。唐代瓷窑遍布南北各地，除了常见的白、青两大系列外，还有黑釉、酱釉、黄釉等品种。

唐代后期商业依然很繁荣。长安和洛阳在安史之乱后得以恢复昔日的繁华，而长江流域的城市则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处于长江和运河交汇处的扬州，成为中外富商巨贾荟萃之所，其繁华居于蜀中著名的商业都会成都之上，故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洪州（今江西南昌）都成为商贾辐辏之地。

商业的繁荣发展，旧的坊市制度被打破了，城市里燃烛张灯的限制也动摇了，在南方的商业都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扬州，卖金银首饰、彩帛的商店和经营各种饮食的

酒楼都在居民区开张，还出现了夜市，夜市灯火辉煌，酒楼彻夜笙歌。中小城市繁荣起来，无不如是，甚至乡村集市也有在夜间进行的。这说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城乡之间联系不断扩大，种种不利于发展的制度正在被逐渐改变。

活动在商业都会的外国商人也很多，扬州、广州二地最集中。据说唐末黄巢起义打到广州，杀死的胡商人数有十二万到二十万人之多，虽有夸大的成分，却不妨令我们想象一下广州外商云集的情形了。此外，在商品交易频繁的情况下，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具有信用性质的柜坊，商人凭票据或者信物，可以易地支取巨额现金。柜坊的出现，有利于商品交易活动的发展。

随着南方经济的兴盛，漕运在唐代经济生活中有着经济命脉的重要意义，江南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输入到北方，充实关中地区。因此，可以说，唐代的繁荣，就是建立在漕运事业的发展基础上的，唐后期这种依赖程度更加明显。然而，恰恰在唐后期，无论是运河的疏浚、整顿、管理都呈现颓势，尤其是藩镇割据称雄的局面越演越烈，藩镇枭雄经常人为阻塞交通，所以，南方经济的繁荣和北方关中地区经济的走向衰落，是漕运事业衰落后唐朝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也预示着盛极一时的唐王朝走向衰亡的命运。

唐朝灭亡后，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的时期，这便是五代十国。这段为时五十三年的大分裂时期是我国古代的最

后一次分裂，持续时间也最短。五代十国在经济发展上并无建树，却反映了唐后期经济的某些特点，即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若干个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适当的人力、财力、物力便于军阀形成各自分割独立的小国。共同的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的经济联系，既可以说这是唐代中央政权消亡后的继续，又可看作是新的全国统一到来之前的短暂间歇。五代十国的经济受到了战乱破坏的影响，在各自统治区里又不同程度地得以恢复甚至发展。经济发展最终要求更大的统一的市场，因而政治上的统一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第七章

神奇的无形之手

一　精细耕作农业体系的形成

公元960年建立的宋王朝，经过廿余年的经营，大体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使命，继汉唐盛世之后，成为封建社会经济繁荣的又一高峰。同时，继续以它在经济、文化方面引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

农业是封建国家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宋朝正是以它精细耕作为特点的农业生产技术全面走向成熟，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此外，手工业和商业在规模、经营方式上也突破了旧日局限，整个社会面貌从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随着冶铁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宋代铁制农具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增进。如中耕主要农具铁锄前半部呈弯弧形，形制更为轻巧。在缺乏畜力的地方，政府大力推广一种使用人力的铁木翻土农具踏犁。镢头、铁搭等翻土、培土农具的形制也已经与近代基本相似。宋代农民还创造了一种用于水田操作的农具秧马，提高工效，节省体力，在岭南、两浙、江西地区得到普遍的推广。

宋代农村中，主要的排灌农具水车也得到普遍的应用。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地方，出现了一种利用水作动力的大型水车，车身是一个能旋转的轮状装置，河水冲动车身使其旋转，车身上的竹筒便周而复始地将水输入田间。在无法

以水作动力的地方，则以龙骨水车解决引水灌田的问题。水车的广泛使用，增加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在土地资源的开发上，宋代农民也有许多新的创造。梯田是丘陵地区人们充分利用土地的一种形式。在山多地少的地方，将土山修成一层一层阶梯状，如有水源自流灌溉则种植水稻，如无水源便种植粟、麦。梯田的修建可以保持山坡田土不致水土流失，南方的梯田则体现了对水土的高度利用。宋代四川、广东、江西、浙江、福建一带丘陵地区已有许多梯田出现，促进了南方山区的农业生产。

圩（wéi）田的修筑，则是在修建水利工程，尤其是治理低洼、沼泽地时发展起来的。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民在排除积水、造田改土时，利用某些江河水面高于耕地面，而耕地面又高于部分江河水面或海面的条件，在耕地四周筑环形堤坝，旱时引入水灌溉，涝时又能排水于堤外，遂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官府往往也直接组织人力投入这种修建工程，大的圩田堤坝长达数十里，堤内耕地数百甚至数千顷。滨海地区的海涂利用，一般采用筑堤的方法，并在田边开沟排盐，兼以种植水稗的生物治理碱土的方法，变盐碱土为可耕良田。

在耕种技术上，因地制宜，引进和培育优良的品种，是宋代农业进步的显著标志之一。早在北宋前期，宋政府针对江浙并京畿地区种植的水稻不耐旱、产量不稳定的问题，调取福建地区种植的占城稻种给各地分种，效果十分理想，经过推广，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宋朝政府为鼓励

南方地区试种五谷杂粮，还从印度引进了西绿豆。为了提高土地的复种率和缺水地区的种植问题，又曾几次推广种麦，也收到良好的效果。麦类种植向南方地区的推移，促进了稻麦两熟制在长江流域的形成。随着后来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社会对麦类需求大增，不仅在长江流域，甚至在气候炎热的珠江流域也有种植麦类的记录。

除了因地制宜地选择种植农作物，宋代农民根据不同气候、水土等条件，培育了许多新的作物品种。以水稻为例，越州（今浙江绍兴）有五十六个品种，台州（今浙江临海）有三十个品种。新品种往往针对本地某些自然条件特点，以期获得较好的效果，实际上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位产量。

随着农业生产用具的改进和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南方水稻的栽培技术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精细的技术体系，包括整田、育秧和田间管理。整田和育秧与熟化土壤、缩短生长周期有直接关系，因而也是保证一年两熟的关键。稻田的田间管理，采取耘、耥（tāng）和烤田等措施，这套管理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

南方精细耕作农业技术体系发展的成熟，为广大江南地区如两浙、福建沿海、岭南等地区种植双季稻、其他地区或麦——豆——黍倒茬，或稻麦倒茬的复种方式奠定了基础。复种指数明显提高，单位亩产量也随之提高。从统计数字来看，淮河以北为谷二至三石，米一至一石半；淮河以南一般亩产为谷四至六石，米二至三石，明显高于北

方地区。江浙一带的肥沃水田，尤其是圩田，每亩产量高达谷七石以上。这样，宋代一般土地平均粮食亩产量约为战国时期的三倍，约为唐代亩产量的一倍半。

粮食产量的增加，既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数字，即宋徽宗时总户数二千零二十六万户，分别达到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汉、唐两朝统计数的两倍，估计北宋时人口最多时曾超过一亿。

随着江南水稻产量在全国粮食生产中比重日益增加，尤其是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成熟，“苏湖熟，天下足”，意味着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和发展，到了北宋，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终于超过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

宋代农业的全面发展，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种植的推广和农产品向商品化发展趋势的出现。

传统的桑麻种植依旧是农村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在南方地区，果树的栽培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柑橘和荔枝。从江南地区一直到福建、岭南，种橘历史悠久，注重栽培技术，各地都有一批地方名品。苏州太湖畔洞庭山甚至出现了完全以种植橘子为生的专业户，因为种橘的经济收益较种粮高得多。荔枝的产地主要在福建、四川和岭南，以福建最好。宋代商品经济十分发达，荔枝不仅是京都富贵人家品尝的名果，还远销海外的日本、高丽甚至阿拉伯地区。每逢荔枝开花季节，商人便来到产地，预付定金，按

地块包买包销，收获季节时再来取货。据说，这样一来，产地的人们反倒不大容易尝到新鲜荔枝了。

饮茶已成为宋代寻常人家的生活习惯。宋代茶叶产量大，品种多，制作工艺也十分精细。产茶地区遍布淮河以南广大地域，以福建所产最负盛名，称为建茶，是进奉朝廷的贡品。两浙地区茶叶数量最多，同时，又以湖州紫笋、绍兴日铸茶等名品著称。四川成都、利州二路也以产茶数量之多闻名。种茶的园户在收采季节往往临时雇工，多者达数十人，采茶并进行加工。至迟到南宋，用茉莉花熏制花茶的方法也已经出现。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宋代农业中园艺化的程度也大大提高，主要集中在蔬菜、药材、花卉的种植上。在各个城镇四周都出现了一些面积较大的菜园，人口稠密的都市近旁，这种菜园达到一望无边的程度。种植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各地一批掌握专门技术的种菜专业户的出现，他们甚至是积数代人的经验，以所出菜蔬鲜美时新而闻名。毫无疑问，经济上的收入便十分可观。北宋汴京城郊的一名菜农凭种菜的技术养活全家三十余口人，临终前告诫后人说，门前那十亩菜园，简直就是出钱的“青铜海”啊。四川是药材生产十分丰富的地方，有些农民便以培植中药材为生，经济收益也很丰厚。

宋代观赏花卉成为一种风气和时尚，因而刺激了园艺中花卉培植业的发展。洛阳、陈州（今河南淮阳）、扬州、苏州、广州、杭州等地，出现了一批专靠种花的园户、花

户。北宋时洛阳的牡丹品种已有九十多个品种，扬州名贵芍药有三十三个品种，苏州的菊花有二十七个品种。因为有市场需要，有些园户种花如同种庄稼，面积动辄以顷计。园舍相望，栽培的花木，多达数万株。为了促成栽培，花农发明以湿热蒸气熏、以硫磺水灌、以纸帐密室催放等诸多办法，显示了宋代园艺栽培技术的进步。

此外，人工养鱼业也较前代有了明显发展，从记载来看，长江以南地区以及荆湖北路都有农户经营池塘养鱼，一般池塘为一亩或半亩，养鱼者的收入数十千贯到数千缗不等，应该说是比较丰厚的。人们已经十分注意鱼种的培养，长途贩运鱼苗，也能获得较大的利润。

从宋代农副产业发展的情况，我们可看到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已经发生密切的关系，这正是宋代农业的一个明显特征。

二　巧夺天工的手工业

宋代的手工业中，冶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产铁州军的增加，日常生活用品中铁器运用得更加普及，以及出现了一批以制作日常用铁器著名的工匠。我们今天使用的剪刀式样很可能就是宋代铁匠改革发明的成果。冶铁过程中，除了使用传统的皮囊进行鼓风，又发明了一种用于鼓风用的风箱，称为木扇。这使鼓风时更加便利，是

一项改进的新技术。此外，冶金发明中，如胆铜生产通过改进，已发展成大规模的手工业。宋代因商品经济的繁荣，铜钱铸造数量极大，所以，铜、铅、锡的开采和冶炼远远超过了前代，重要的铜产地如韶州岑水场、信州铅山场，年产量都达数百万斤。

丝织业发展的表现，在于北方地区依旧保持丝纺织的优势，而南方的丝织技术则迎头赶上，呈现出南北丝织品争奇斗艳的局面。南方以两浙路为基地，江宁府、润州、杭州等都成了著名的丝绸产地。宋朝的财政支出中每年用绢约四千一百万匹，这样大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从品种和质量来看，越州（今浙江绍兴）罗的新品种万寿藤、七宝火齐珠等，纹络凸显而晶莹有光泽，华美异常，超过了唐代的精品宝花罗。

宋代丝织工艺水平的提高，与大批专业丝织工匠的存在有密切关系。在宋代户籍中，有专以织绫锦为生的机户。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除了这类专业的机户之外，甚至还有雇用工徒的机坊、染肆，其中雇佣关系的程度虽不十分明晰，却表明了原先作为家庭副业的丝织业，已经显露出向专业化手工业发展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原先仅限于西域和广西地区的植棉及棉纺技术，到了南宋中后期，已经流传到两浙地区。1975年在浙江省出土的一条纯棉织成的棉毯，长二米五，宽一米余，质地细密，拉毛均匀，显示出十分成熟的棉纺工艺。

就工艺水平发展而言，手工业中进步最明显的是制瓷

业。宋代的制瓷业是在社会文化和科技水平提高的交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成为名副其实的绚丽多姿、光彩照人的事业。

宋代制瓷窑址的分布，遍及十多个省，一百余县，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或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都出现了制瓷业。官办制瓷窑场规模宏大，民办窑场也星罗棋布，十分兴盛。宋代的六大名瓷，产自工艺水平发展成熟，且以其产品为后世珍藏的六大名窑，即汝窑、官窑、龙泉窑、定窑、钧窑和景德镇窑，各具鲜明风格特色。如汝窑以其制作精致，釉莹厚如堆脂，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且产量少，多为皇室使用而倍受珍视。官窑的代表作品多出自迁都至临安时期，以青瓷为主，釉有开片，形如蟹爪。龙泉窑因其主持者为兄弟二人，又分为哥窑、弟窑两种。哥窑因以釉面细密如冰裂的开片，故又有百圾碎之称；弟窑则以无开片的厚釉青瓷器著称。定窑以红瓷器为时人重，有“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赞誉。钧窑胎体厚实端重，烧制时，釉液流动形成自然花纹，红紫绿黄诸色相杂，绚丽多彩。景德镇窑所在地原名昌南镇，北宋真宗景德年间为宫廷烧制瓷器，大受赞赏。因得赐名景德镇，亦以其瓷器洁白细密，釉色纯净、透明而驰名天下。

宋代制瓷不仅在造型、瓷釉成分上有了很大进展，装烧技术也出现了重要的发明，如将盘、碗、碟类器皿反扣过来烧造的覆烧法，最大限度地利用窑位空间，节省燃料，又防止器具变形，且降低了成本。受到宋代文化的影响，

一些宋瓷的造型、色泽，讲究高雅的审美趣味，往往体现了诸多艺术与制瓷工艺相结合的完美风格。宋瓷通过水上运输大量出口到海外，远抵欧、亚、非三洲，以至海外贸易又被人们称作海上瓷器之路。

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最后形成于宋代。其中，造纸术虽始于东汉，工艺上的真正成熟，以及各种特殊用纸的出现，集中体现在宋。比如以竹为原料制纸，虽在唐人文献中有记载，到宋代才真正解决了其脆而易碎的难题，从而得到推广。从技术上说，造纸原料由麻过渡到树皮是一个进步，由麻、树皮过渡到竹，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代的造纸工人运用新的抄纸方法，能制造出长达三丈到五丈的巨幅纸，显示了非凡的成就。宋代工匠还掌握了制造水纹纸的技术，水纹图案复杂，精致可爱。宋代具备的大量生产普通用纸的能力，满足了因印刷事业发展和日常所用的大量需要，对社会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宋代远洋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及近海和内河航运业的需要，宋代造船技术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因漕运任务繁重，每年需要大量船只补充，盛产木材的北方地区陕西以及河北、山东，一直是制造内河船的重要基地，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和广州则是以制造海船著称。据记载，北宋末为出使高丽而造的“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可载二千斛粟，约合二千石。同行的“神舟”从规格和载重量来看，三倍于“客舟”，则当接近万石了。

一般出海的客船，装备也十分齐全，船舱高及丈余，四周开设窗户，入门处设有装饰华美的栏杆，并遮有帘幕。唐人发明的水密舱技术，已经普遍应用到河船和海船的制作上，一旦出现船舱破漏，由于各舱间密不透水，不致全船进水，安全可靠性增强了。从几次出土的宋代海船来看，船形大致呈尖头、尖底，尖底船吃水较深，抗御风浪能力较强，尖头则便于破浪疾驶。此外，船舵技术也有很大改进，如已经出现操纵便利的平衡舵，开孔舵的发明，也大大降低船舵的扭矩，使用更为方便。

宋代在航海技术上由于采用指南针定位导航，也是促使远洋航运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　煌煌灯火话夜市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最典型也是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城市面貌上的变化了。

由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宋代城市人口比前代明显增加，全宋三百多个州，大约有近三分之一的州府所在地人口超过了十五万，具备了相当规模的城市面貌；其中，大约十五个城市的人口在四十万以上，则是繁华的大城市了，如当时四川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苏州、泉州、广州等。由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而出现的新兴城镇也不少，如著名的瓷都景德镇，有瓷窑三百余座，居民人数不会少

于数千家；嘉兴府澉浦镇、江陵府沙市，都是地处交通要冲的商品集散之地，很快发展成商业性城镇，也各有居民数千户。

宋代先后在开封和临安（今浙江杭州）建都，这两个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了一百万，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城镇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从事非农业性生产活动的人口比例的增大。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显示了宋代社会、经济新的面貌。

先秦以来，城市的布局中，皇城、宫城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民居设在坊内，四周有围墙。商业活动则被限制在独立于坊外的市内，市内有人管理并巡视商品交易过程，



清明上河图

太阳下山之前必须收市。随着商业和交换的发展，这种官方设市的体制终于开始被打破，这种趋势在唐后期社会已经显露出来。到了宋代，大都市里的商业活动已经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不但在居民区街道上建造商店，从著名的北宋社会风情画《清明上河图》里我们还能看到推车挑担沿街进行叫卖的商贩，城与市终于融为一体了。

商业活动不但打破了空间上的限制，时间上也不再限于白天进行。开封和临安的闹市区商店和酒楼等消费场所，往往三更才关门，五更以后又开门营业了。夜晚的商业活动甚至比白天更为热闹。此外，还有一种“鬼市”，主要在拂晓前做生意，五更时分点灯进行交易，买卖衣物、图画之类，天亮即散。

坊市的取消和夜市的出现，不但表现了宋代经济的繁荣程度，也被人们看作古代城市史和商业发展史上带有标志性的转折。

随着商业活动的迅速发展，都市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的商业街，甚至从皇宫正门前延展到开封外城南薰门的御街两侧，一度也允许人们在廊子里设肆做买卖。各商业街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如开封东华门外的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因面向皇宫做生意而兴盛起来的，时新花果、鱼虾、鹁兔、金玉珍玩、衣着首饰，无不以珍奇价昂著称。新鲜瓜果、蔬菜刚刚上市时，宫中各部门纷纷不惜以高价购买尝鲜。潘楼街则以经营金银彩帛的商店为主，屋宇雄壮，门面宽阔，一笔大的交易，价值上千万，非普通平民能问

津。马行街则以饮食业集中，尤其是夜市的繁荣著称。开封诸多酒楼、饭馆中，以樊楼最著名，五座三层酒楼，用天桥连接相通，入夜则灯火辉煌。酒楼为了招徕客人，设备竞相豪华，杯盘器皿多用银器。有的酒楼为了迎合士大夫文人的爱好，还特意布置了书画典籍，营造雅致的气氛；有的则在开张最初几日为前三名顾客设金旗为奖，进行促销。马行街因饮食业集中，厨房的油烟气令街上蚊蚋绝迹，被人们视为异事。即使到了冬天，刮风下雪，饮食夜市照常人声鼎沸。

南宋临安的商业街又多于开封，凡是大街小巷，临街的门面，多被大小店铺占用，几乎没有空闲的屋子。最繁华的商业街有官巷南街、珠子市街、朝天门街等。官巷南街集中了许多金银交引铺，珠子市街则以经营珠宝生意为主。南宋时期的杭州，已经有了“丝绸之府”的美誉，各种专售丝织品的彩帛铺也出现在街上，著名的有刘家、吕家、陈家、钮家等，皆以货样丰富、质量保证而享有一定的声誉。临安城里还有一批以翻刻书籍和卖书为生的书铺，刻印的唐宋以来名人诗集、笔记小说深受读者欢迎。

在宋代商业活动中，还出现了以经营某一地方特产为主的店铺，其性质类似今天的专卖店。如经营以工艺精美的漆器为主的温州漆器铺，无论是开封，还是在后来的临安，都是闹市区一家引人注目的老字号商店。

日常生活消费品，则往往形成若干相对集中的市场，如开封新郑门、西水门的活鱼市场，临安城北的米市、城

西的鱼市、东门外的菜市，以及城南江干的柴市，生意兴隆，货源充足。

宋代商业活动不仅在商店里进行，而且还有一些进行集中贸易的市场。北宋时开封最著名的是相国寺市场。由于相国寺位于开封中心，又紧傍汴河，交通十分便利，每月逢三逢八和朔、望日共开放八天，云集了四方商贩。货物众多，从日用杂物、笔墨文具、衣帽饰品、书籍古玩，到珍禽奇兽、土产香药，几乎全国各地的特产都云集这里，甚至一些卸任官员回京时带回的土产风物，也托人拿到市场上出售。还有些交易市场则与某些商品的特色相关，如每年端午节前在开封潘楼附近举办的扇市，以经销各种扇子为主，兼售其他种类的夏令用品。在四川成都，集市更以其特色吸引了西南地区的商人前往。按照四季十二个月的特点，成都每月一集，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每次集市突出经营某一商品，兼营其他类别。



北宋交子

由于商品货币的发展，北宋政府铸造钱币的数量虽然比前代大为增加，仍不能满足需求。最初，出现了四川地区几家富豪人家发行的“交子”，在有限范围里代替货币，不久，便由政府收夺了发行纸币的权力。先在成都，负责印

制发行纸币，后来范围越来越大，专门设置交子务，负责纸币发行。这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

宋代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无形之手，将产于各地的物资调集到了中心城市，尤其是消费水平最高的都城。南方的各种珍奇水果出现在开封、临安街上的水果铺里，用四川甘蔗熬制的糖霜加工成的各色甜点心、冰镇饮料，也成为都市市民得以尝到的美食。茶叶集中出产在南方地区，却是大江南北人们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各类罕见的海鲜食品，也出现在开封酒楼的食单上。

无论在开封，抑或南宋的临安，人们还常能看到来自海外的异国客商。在沿海的泉州、广州、明州等地，外商更为集中。宋代在沿海大城市设置了市舶司，管理进出口商品的税收。瓷器和丝绸品依然是出口商品的大宗，宋代的铜钱也是吸引外商的特殊货物。宋代极为繁盛的海外贸易，表明两宋时期的中国依旧以其繁荣的物质文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一如既往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四　民族经济的融合与发展

与宋代并存的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在宋灭亡后又维持了近九十年统治的元朝，其共同特点都是起步于经济形态较为落后的游牧部落，然后在短时期里吸

收了中原先进文化和经济的成果，逐渐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来的。

辽从建立政权起，经济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渔猎经济、畜牧业经济和农业经济。长期的对外用兵，使辽的农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直到辽圣宗时，农业才有较大发展，畜牧业则始终是辽朝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

辽朝的手工业主要有冶铁和陶瓷业。从辽朝每年向宋贺新年用的镔铁刀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中原先进的灌钢技术。而辽朝铸造的大量铜佛像、铜镜、铜器皿的情况则表明了辽朝也掌握了铜的冶炼工艺。制瓷业则在辽已是非常普遍的技术，瓷质和釉色都十分出色。与铜器铸造一样，辽瓷的最大特点在形制方面，即根据游牧民族鞍马毡帐生活的需要，具有典型的契丹民族风格。

辽朝的商业活动以行政和军事首府五京为中心而展开，与西夏和宋朝都保持着较多的贸易往来。由于贸易数量有限，每次聘使往还，也常常带有重要的经济使命。

金朝经济是在辽和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上承辽宋，下启元代，因而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原先女真族以猛安谋克牛头地形式转为土地私有制，同时，女真族也完成了封建化的转型。此后，金代经济开始了较快的发展，金代农业经济中心北移，推动了东北地区耕作技术的提高。同时，在统治者的督促下，原来不精于稼穑的女真人吸收了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由粗放耕作向精耕细作发展，单位亩产量达到三到五石之间。金人灭宋南下

后，中原地区的农业水平保持了北宋的水平，南部地区与南宋相当。由此看来，金代农业经济不但继承了中原人民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将其推广到东北部地区，对促进各族人民农业生产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进入中原后，金逐渐恢复了辽、宋地区的手工业，如冶铁、制瓷、纺织业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中原各地的陶瓷业在金朝统治下陆续得以恢复，著名的钧窑则进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钧窑由于其釉色在烧制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绚烂色彩，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


忽必烈画像

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消灭了南宋，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元朝统治者是蒙古贵族，统一之后的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社会经济的开发，是元朝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

元初统治者很快改变了原先将农田改为牧场草地的做法，强调以农桑为急务，推广农业技术。开凿陂塘河渠，兴建水坝水闸，并组织力量，在中原以及北方、东北、西北和西南各地区进行屯田垦殖。由于南方受战争破坏较少，恢复社会生产后，南粮北运，使元朝中期的社会重新出现了繁荣景象。

重要经济作物棉花开始普遍种植，并扩大到了全国。这其中包含着兄弟民族如维吾尔族和黎族人民，对棉花的

种植和推广作出了重大贡献。棉纺织业也成为元朝的新兴手工业，松江地区的棉布成为全国著名的产品。从此，棉布逐步代替了麻织品，标志着纺织和服装业的显著进步。

元朝统治疆域空前广大，因而国内外交通畅达，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全国水陆驿站一千三百多处，大都（今北京）、杭州、泉州、广州等地都是闻名世界的大都市，用桑皮纸印的中统元宝交钞通行于全国各地。这种面向世界开放的宏大气势，使元代贸易的世界性特点格外显著。泉州是对外贸易的最大海港，有海船一万五千余艘，使人感到这是世界贸易的中心。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谈到他对大都的印象时说，城内城外都建有高大华丽的建筑，各地的货物源源不断运来，川流不息，城里到处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外国人。

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也促进了元代的造船业。用于远洋的船舶船体大，结构坚固，装有十数面能转动的船帆，能适应各种风向，并装有罗盘等先进的航海仪器。

辽、金、元三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成就，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

第八章

鸡鸣晓看天

一　鱼鳞图册与明初经济的恢复

明王朝是建立在元朝的废墟上的。

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震荡，北方地区再度出现大量荒芜的无主田。大量奴婢在元末战争中恢复了自由，改善了地位，然而，如何巩固明朝统治的经济基础，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成为明朝统治者亟须解决的问题。


朱元璋画像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对于农民的困苦，有较深的认识，农民起义的现实也使他意识到“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这一朴素而又十分根本的治国纲领。明初的经济恢复，便围绕解决户口的兴衰和土地的利用这两个基本问题而展开。

移民屯垦，是明初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主要有洪武初迁苏、松、嘉、湖、杭五府无田之民四千户往临濠，由官府资助耕牛、种子、舟车、口粮，三年不征田租，所垦荒田归开垦者所有；又三次移山后（今山西、河北北部长城内外地区）民近十万户赴北平耕种；徙山西、河北真定等地无地农民往凤阳种田；洪武二十年，还命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耕云南。类似这种大规模移民垦荒的记录次数繁多，而且持续多年，一直到明朝立国四十多年后的永乐十四年，还迁

徙山东、山西流民到保安州（今属陕西）屯田垦殖。

这种移民垦殖，保证经费上的支持，又有赋税减免的优惠，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速了荒芜田地的开垦，也缓和了元末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很快便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除了民屯，明初还实行军屯，试图做到军粮自足；实行商屯，即由商人纳米输边，换取盐引。而数量最大，效果最明显的还是民屯和军屯。明政府依靠政权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屯田垦殖，是明初期经济得以很快恢复的主要原因。

明初还有意识地采取了迁徙豪民政策，责令富户承应各种差使等做法，借以消耗他们经济上的力量，减缓大土地集中的现象。如责令豪富沈万三出资修南京城墙的一半，责令豪富钱鹤皋等按田地数交纳城砖，用以修上海城。

明政府对水利灌溉设施也十分重视，设都水营田使，专管农田水利，并令地方官吏将民间兴修水利的报告及时上报。明初在和州修铜城堰闸，周回二百余里；又浚泾阳洪渠堰，使泾阳、三原一带田地受益范围达数百里之广。又浚定海、鄞二县东钱湖，溉田数万顷。后又特下谕令，凡可以蓄水防旱的陂塘湖堰都要修治，并遣国子生到各处督办。成塘堰四万余处，河四千余条，陂渠堤岸五千余处，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明初还规定了农民必须按田亩数的比例种植桑麻和木棉，并且，还将这些经济作物

种植数量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标准。而且，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也为家庭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成为明、清时期丝织业和棉织业发展的基础。

洪武年间，明朝政府还在各地州县设置“预备仓”，规定州府县各置东西南北四仓，储粮备荒。这些粮仓多者藏粮万余石，少者也有五千石，遇有水旱灾情，便将这些粮食贷给贫苦无粮的农民，平时，则注意随时补充。这些储备谷物还可用于修建公共水利工程支出，颇受一般农民称誉。

明朝政府为有效管理户口、征派赋役，特意制定了一套有关田亩登记和户籍的制度。

洪武二十年（1387），派出国子监生武淳等巡行州县，开始全面清丈土地的工作。他们先派官员到州县，根据税粮多少，定为若干区，每区设粮长。然后，会集里、甲居民，丈量每块土地方圆四围，绘成简图，依次编号，再注明田主姓名、田土肥瘠情况、面积大小，最后编类成册。这种画着圆角形田土的登记册看起来十分像画着一片片鱼鳞，所以又叫鱼鳞图册。

鱼鳞图册详细登载了田土的各种情况，如遇到土地买卖，只需到各州县主管部门登记造册，赋税亦随新田主过户。推行这种土地登记制，使征收赋税有了依据，有利于堵塞逃税或产去税存的不实，国家的赋税收入得到保证。

根据全国鱼鳞图册登记情况反映，洪武二十四年完成清查土地工作后，土田面积由原先三百六十六万余顷增加

到三百八十七万余顷，赋税收入中仅米麦一项便增收六百余万石。

户籍也重新进行登记。以户为主，每户成员按丁和不成丁区分为两类。户籍图册一式四份，除中央户部保存一份外，另外三份分别由布政司、府、县存案。因为上报户部的那本图册用黄纸做封面，所以，这本赋役登记册又叫黄册。

明代户籍分民、军、匠三种，军、匠户不承担一般差役。乡村的民户每一百十户为一里，推选其中人口和税粮较多的十户，每年以其中一户轮值为里长。每甲管辖的一百户又分为十甲，每甲十户，设甲首一人，由十户轮流担任。里长、甲首各一人，管理一里一甲的公事。每十年一次，根据人口变动情况，重新造册。民户又以丁粮多少，分上、中、下三等，供役时即按等划分，有所区别。凡漏户、逃亡若返回原籍，允许另报编册，不予责罚。

经过赋役黄册的编定，使政府直接掌握了最基层的里甲人户情况，也限制了农户的流亡，保证了差役的来源。根据洪武二十四年的统计数字，全国共有一千零六十八万余户，五千六百七十余万人。

鱼鳞图册和黄册的出现，意味着统治者对农民控制的加强，也反映出统治者进行控制的操作手段逐渐趋向精细化、合理化，效率也明显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尽管明初统治者推行的仍是“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商业活动还是开始活跃起来。南

京、苏州及大运河沿线的杭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直沽等地，商贩往来，成为商业繁荣发达的中心城市。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北京也迅速发展成北方地区最著名的大都市。

二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朝中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显著超过了前代。

农业生产技术不论在耕耘、选种、灌溉、施肥和园艺等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福建、浙江等地有了早晚稻兼种的双季稻，岭南出现了三季稻。同时，北方地区水稻面积也有了增加。大量种植在江浙、福建一带的番薯以及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的出现，意味着农业生产又有了新的发展。

明代后期农业进步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棉花是种植地域最广的经济作物，由于政府的鼓励，所谓“地不分南北，遍种于天下”，而且，在农产品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强。出产的棉花，主要是作为商品投放市场。

丝织品仍是社会上层人士消费的主要纺织品，加以海外贸易需要的刺激，蚕桑业仍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尤其在杭嘉湖地区，据计算，种桑养蚕所获利润，大约高于种粮的四五倍到十多倍，即使是平常年景，也要高出二三倍。

在明显的经济利益的鼓励之下，种田不如种桑成为农家普遍意识，以致桑蚕区桑树种植面积远远超过稻米种植面积，甚至出现了种桑树万余株的人家。每到需要大量桑叶饲养的时节，还出现了到各地收购桑叶的商贩。

烟草种植始于万历年间，先在福建、广东种植，继而迅速传到北方。明政府曾经下令严禁种植，然因为种烟可获厚利，对农民来说仍是挡不住的诱惑。明末，江南江北，到处栽种，虽未成年的少年，也沾染上吸烟的习气。

茶叶种植也有发展，而且在各产茶区都出现了各自的名品。虎丘天池茶和钱塘龙井，被认为是天下之最。此外，温州乐清、瑞安胡岭、福建安溪等，都出产人们追逐的优质茶叶。有些产茶区茶叶栽培加工在农业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超过粮食作物。

随着城市和市镇的发展，城镇近郊蔬菜种植业和花卉种植业也日益兴旺起来。北京附近不仅种植各类北方蔬菜，还将南方白菜移植到北方，大量种植，每逢秋末，则大量上市，人们纷纷购置收藏以御冬。北京的菜农还利用温室栽培韭黄、黄瓜及各种花卉。其他如江南湖州的菱藕、竹笋、竽、姜，广州农民培植的鲜花，苏州虎丘人精心制作的盆景，北京郊区丰台农民种植的连畦接畛的芍药、牡丹，都成为城市里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受到市场需要的刺激而大大增加种植面积，加上城镇人口的发展，使商品粮的需求大增。江南地区经济最活跃，到了明中期，“苏湖熟，天下足”的

情况起了变化，苏南、浙西一带出现粮食匮乏，需要从外地大量输入。福建和广东也是传统的富庶土地，由于广种烟草、果树、染料植物、蔬菜，都逐渐变为仰靠外地粮食输入的地方。这种现象表明，商品经济不断地在向纵深发展，使农家经营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新模式。本来是追求使用价值的小生产者开始转化为追求交换价值的商品生产者了。传统的农业结构逐渐被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和加工这些经济作物的手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结构替代，这意味着传统经济结构开始出现了变化的先兆。

明朝中期以后，手工业如冶铁、制瓷业等也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一批规模较大的冶铁和铸铁业出现，如河北遵化的铁炉深一丈二尺，一次可熔矿砂两千多斤。景德镇的制瓷业达到高峰，成为名副其实的瓷都。民窑烧制的薄胎纯白瓷、青花瓷及各种颜色釉都赶上甚至超过了官窑的水平。

突出反映手工业生产水平和技能的是当时最发达的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经过改良设计的织机，具有比过去更高的效率及织出花样更复杂织品的能力。在明末苏州的市场上，织机的功能分别为绫、绢、纱、罗、绸、布六种之多。棉纺织业因为出现了脚踏纺车和装脚的搅车，弹弓也改竹弓绳弦为木弓腊丝。棉纺织业成为普通的家庭副业，对经济生活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虽然形式上还保持着一家一户一手一足的操作，汇聚起来却十分可观。松江成为棉纺织业的重镇，当时有着“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

的说法，可见松江棉纺织品投入市场数量之多。

手工业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则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的趋势比以往更为显著。例如，在盛产丝织品的江南，嘉兴王江泾镇七千余户居民，已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织绸收丝缟的工作。吴江的盛泽、黄溪的居民，几乎家家投入生产丝织品的劳动中去，有条件的人家还雇人相帮。松江城郊的农民，有许多人已经将织布看作自己的专业，还有专门从事棉花加工的轧花业、弹花业，以及专门从事棉布加工的浆染业、踹布业。比较典型的是松江的棉布袜制造业，用尤墩布制成的暑袜因薄而轻巧，且制作美观而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所以地方上出现了百余家袜店。一个郡的男男女女，几乎都是靠此来谋生，他们从店主那里取来原料，回家后再作缝纫，完成后送还店主出售。这差不多已经是资本家与雇工的关系了。

在同一生产部门中，由于工艺流程复杂，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线，因而也因为分工不同，出现了新生产关系的萌芽。如规模较大的冶铁工场中，从开矿、烧炭、运输、冶炼，都是雇佣而来，与雇主之间并不存在依附关系，纯粹是追逐利益而受雇的自由劳动者。显然这已经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了。

随着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和手工业生产的进步，商业在明代中后期也达到空前的繁荣。商业经营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地区，许多商业中心城市

人烟稠密，竟日喧闹，各地珍奇异物，集中展现在店铺里，令人目不暇接。为了适应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需要，各地都出现了许多大小商人，远离家乡亲人，奔走在四方经营买卖。其中，还崛起一些地区性的商人集团，如著名的徽商、晋商、福建海商等。徽州因坐落在山岭川谷之中，人口密度高，地少人多，求生不易，所以流寓四方，足迹遍及天下。徽商经营的范围也极广，盐、粮食、木材、文房四宝、丝织品、茶叶乃至典当业、旅馆，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组织各种商帮。晋商即山西商人，经营起家的原因与徽商也十分相似。

商品货币经济高度发展，于是出现了白银流通的现象。明中叶以后，市场上商品都已用银来计价，官吏的薪俸、国库开支也用银来支付。明朝中期推行的赋役制度改革即一条鞭法，将原来的徭役部分改为用银代役，便是货币经济发展催化的结果，同时也意味着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更进一步松弛。

商业发展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甚至连传统的“本末”观念也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认为农民从事生产，商人则以通有无，两者不可偏废。更有一批知识分子如著名思想家李贽等人对世人鄙薄商贾表示不满，王阳明、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都强调了商与农工一样，都是本业的观点。

明代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诸多新现象，使人隐约感到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处于一个新时代将要到来的前夜。

三　盛世与危机

明崇祯十七年（1644），满洲贵族率军入山海关，镇压了明末农民起义后，开始了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明末统治者的骄奢腐化，以及土地兼并激起的社会诸多矛盾，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经历了明末长达十余年的社会动乱，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工商业也受到严重摧残，清政府急待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尽快恢复社会经济。

清前期顺治、康熙二朝，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措施。如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停止满族入关不久实行的圈地活动并退还圈占土地；治理长年失修而水灾连续不断的黄河与淮河，疏浚南北经济命脉大运河；废除明代遗留的匠籍制度，解除了手工业者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取消各地官吏对商人的额外征收，鼓励商业活动的发展；废除清初颁行的迁海令，允许有限制地开放海禁等。

上述措施，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清朝的统治进入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全盛时期，同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王朝最后的一次盛世。

农业耕种技术在雍正和乾隆时期有了一定的提高。精耕细作原则已被广大农民普遍认同。对于农作物的施肥，

人们在前人基础上，总结了如何根据农作物在不同的条件下施肥的经验。在水利灌溉的工具方面，风力或畜力水车比较流行，与龙骨水车比较，提高效率，也节省了人力。同时，南方普遍实行一年三熟制、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制，又引进、推广了一些新品种，使农作物不但产量有所增加，品种也更加丰富。

经济作物的棉花、桑树、烟叶、茶叶、甘蔗等发展最快。

棉花的种植此时已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各地棉花种植，有些是属于自给自足经济范畴，而在一些棉花产区，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一半以上，甚至高达百分之八九十。显然，这些棉农已经成为棉花种植到纺织市场的一连串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一环。从明后期起，江浙一带织布业发展迅速，以致本地所产棉花已不能满足加工需要，大批由邻近地区购得。这便是清中叶所谓“北棉南运”的现象。

由于明、清两代各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少数民族地区所生产的手工业制品，如维吾尔族、蒙古族毛毯，苗族苧布、皮布、土花布，僮族的僮锦，制作精美，也流入市场，并且非常受欢迎。

全国各大小城市还在自己的地方特产和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特种工艺品和手工产品。较实用的如藤器、竹器、柳条器、造纸；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如北京的景泰蓝、雕漆、镂金、骨雕、木雕、牙雕、绢花；南京的刻书、包头绢、库缎；苏州的刺绣品、织锦缎、细木器、

小铜器；杭州的杭扇、杭伞、杭剪、杭烟；广东的漆器、纱、缎；安徽的纸、笔、墨；昆明的铜制品；新疆的玉石制品。清朝中叶，这些地方传统名产的形成，也反映了手工业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商品生产的发展，使全国各地的商业又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许多城市恢复了明代后期的繁盛，而南京、广州、佛山、厦门、汉口等城市，则超过了明代。如佛山棉纺织业极为发达，商铺、市集、作坊如林，全城大街小巷有六百二十二条。汉口处中原通衢大道旁，四通八达，又是长江航运的重镇，南下云贵，西到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举目江边，过往商船，所谓帆樯相属，不舍昼夜。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的中心，来自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如关东的貂皮、人参；西藏的红花、麝香；新疆的毛毯，内蒙古的裘袍，以及来自西南地区的贵重药材都出现在北京的市场上。同时，如瓷器、陶器、绸缎、布匹、烟、酒、茶、粮食等都是少数民族十分需要和喜爱的商品，则常常从北京向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批发。

清代的商人中，最富有的是票号商人、盐商和被称作广东十三行的行商。这些商人往往有官商的背景，甚至就是政府官员所开设的钱庄。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或代办汇兑、存款、贷款等，与银行的性质有相似处，但除了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范围里经营之外，几乎不涉足手工业生产的投入，因而与工业资本形成或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没有什么联系。

从清中叶开始，清政府着手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实行了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使农民进一步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实行按土地征税的制度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无地或少地贫苦农民的负担，人们也不需要以逃亡或隐匿形式来逃避按人口计收的丁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加上清前期休养生息的政策，到了乾隆中叶，清朝社会出现了人口激增的趋势，乾隆五十六年（1791）全国统计人口数已达到三亿零四百三十五万人，六十年后的咸丰元年（1851）更激增到四亿三千余万，为康熙时期的四倍有余。因此，人口激增对清代社会经济带来负面的效果，明显大于正面，人口增加与耕地不足的矛盾尖锐起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显开始滞缓起来。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地发展。某些行业中包买商的活动更加活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也比明代增多。包买商在手工行业以预付原料、提供织机的方式来控制生产者。生产者取得原料，经过加工后，将制成品交包买商批售。在丝织业发达的苏州，每天清晨，便有大群织工群聚在桥头待雇，并且按工艺类别分别集中在约定俗成的地点，如花缎工聚于花桥，素缎工聚于白蚬桥，等等。丝织业以外，棉染织业、造纸业、铸铁业、陶瓷业等也都出现这种用雇工进行生产的作坊、工场。雇工与雇主的关系是按日按工种发工资，与雇主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除了按日发工资外，也有计件工资的形式。这些都已经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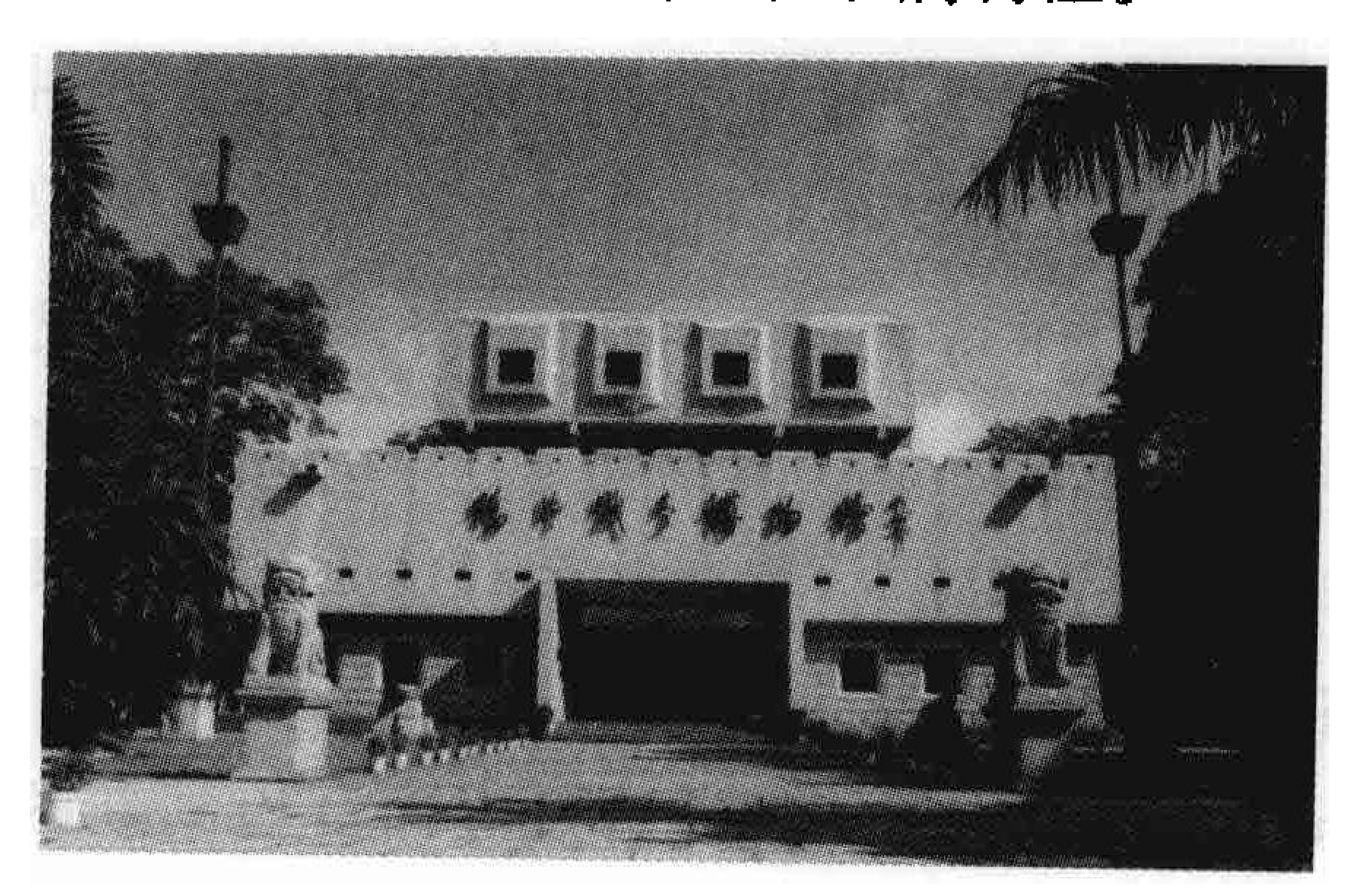
比较典型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各种手工业工人为了摆脱坊主的压迫，遇到明显有损自己利益的问题，开始组织起来向坊主进行全行叫歇的斗争。康熙时期，苏州织布业的踹工，先后四次组织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向作坊主要求增加工资，并提出成立行会“踹匠会馆”的要求。这不仅反映了手工业行会内劳资双方激化起来的冲突，也预示着在社会经济发生重大转型的前夕，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阶级前身的勃勃生机。

清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矛盾正在渐渐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然而，一个外来的因素却立刻使得诸多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并使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陷入了危机，这便是从 18 世纪后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进行的鸦片贸易。

由于在正当的商品交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英商每年需要运送数百万两白银到中国，以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在政府支持下，企图以产自印度的鸦片作为商品走私输入中国，改变对华贸易逆差。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每年输入平均四千箱，到了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1838—1839）鸦片战争前夕，增加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对外贸易的出超变为入超，大量白银由进口变成了出口。其次，由于白银外流，引起国内经济秩序发生混乱，银价飞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受到了严重妨碍，同时，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受到严重削弱。而且，鸦

片流毒全国，不但使人民身心受到摧残，社会风气亦更为腐败，也加深了封建官僚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广东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

当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采纳禁烟的主张，派林则徐到广州查办鸦片时，英国悍然以武装侵略的形式来维护自己贩卖鸦片的特权。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封建社会独立发展的行程中断了，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代社会的经济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危机中。

四　走出中世纪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乃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获得不断发展，是从晚清开始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的主要内容。

鸦片战争以后，产业革命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纺织新技术普遍应用在这些国家。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费用迅速下降，大量的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先是进口洋纱代替土纱，使手纺业和手织业分离，接下来是洋布代替土布，手织业与农业分离。传统的家庭棉纺织手工业在大量质优价廉的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下，终于开始解体了。

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动摇了封建经济的基础。紧随而来的是向中国输出的各种各样机器制造产品，如煤油、铁制品、面粉、火柴、洋烛、糖等。中国落后的手工业制造产品在洋货面前显得质量低劣，成本高昂，自然无法在市场上与之竞争。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更加剧了竞争劣势，如厘金制度实施后对商品流通的妨害。

广大农村中，与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同时发生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清朝晚期，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大举占领手工业产品领域的同时，又大量收购某些农产品，或开办一些农产品加工工业或轻工业。刚刚形成的中国民族资本也经营一些新式机器工业，这些新式工业都需要农产品原料。这样便刺激了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这是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另一重要表现。

农产品商品化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扩大和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桑、烟叶、茶、花生、豆类、罂粟、甘蔗等。上述经济作物，种植扩大的原因都是国际

市场需求的大量增加，如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棉纺织厂大增而对棉花需求的增加；生丝出口连续激增；外国卷烟厂对烟草收购的增加等。罂粟是炼制鸦片的原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取得合法地位，鸦片销路遂大为推进，大量内销鸦片都产自国内。

粮食作物商品化的原因主要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占据了大量的耕地。同时，近代工业的兴起，城镇和商业的发展，导致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也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求。而农业技术进步使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也为粮食作物商品化提供了条件。

由于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所致，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而引起的。就中国全国而言，社会商品货币经济水平仍十分低下，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外国资本入侵的时间、地点也不均衡，使得各地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加以农业商品经济发展依然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使得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不仅持续较长，而且并不彻底。

然而，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历史进步的体现。自然经济解体，使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商品市场开始形成和扩大。同时，大量劳动力开始摆脱几千年来对土地的依恋和束缚，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力，而且，结束了劳动力分散、孤立的状态，劳动的社会化和资本的集中，也为科学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前提。因此，自然经济的解体，意味着中国经济走出中世纪

的第一步。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资本主义机器工业。随后，中国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陆续出现，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约有一百三十家左右。最早的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是创于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从打制修配船用零件开始，逐渐发展到能造小轮船和车床、汽锤等机器设备。开始，私人机器工业主要产生在机器缫丝业和棉纺织业，如广东南海的继昌隆丝厂，以及甲午战争前相继出现在南海、顺德一带的缫丝厂五六十家。上海是私人资本机器缫丝工业的又一中心地区。虽然上海临近江浙产丝地区，又是生丝出口地，却由于缺乏与外资厂的竞争能力而步履艰难。

除了上述工厂外，甲午战争前各地还出现了一批火柴制造厂、碾米厂和机器采煤业。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引进国外资本兴办的工厂中，还有我们向来以四大发明感到自豪的造纸业和印刷业。用机器设备造纸的工厂有1882年创建的广州造纸厂，以及1891年由李鸿章发起募集招股的上海华章纸厂。因为用外国先进技术影印古书而大获其利，许多商人纷纷看准这个投资不大，设备简单的印刷业。从1880年起，十来年时间里，上海、北京、广州、杭州等地出现了这类新式印刷厂十多家。

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是在外国资本大规模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又是以国家经营的机器工业起步，并没有经过正常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更没有经过工业革命阶

段，因而明显带有先天不足的弱点。最初的资本家又多由封建官僚、地主、士绅、商人转化而来，与封建势力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其脆弱性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如此，从清朝晚期这批资本主义工业破土而出起，预示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走出了中世纪的阴影，进入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现代化历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经济史话
作者＝戴扬本著
页数＝１５２
ＳＳ号＝１２６１６６２２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４